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财富管理信息



2021年第2期（总第16期）

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财富管理信息

2021年第2期（总第16期）

目录

★财富管理论坛	1
过渡期延长后，监管对银行理财存量整改有哪些要求？	1
信托行业财富管理业务未来发展的思考	4
中国家族企业迎来传承期，揭秘“继承者”背后的家族办公室	6
国内资管机构研究体系分析	11
《民法典》继承编对私人财富管理有何影响？	14
数字经济进入“算力时代”	15
★财富管理报告	20
2020 方太·胡润财富报告	20
2020 年资产证券化发展报告	24
人民银行发布《2020 年第四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	29
★区块链论坛	32
陈纯院士分享区块链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进展	32
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的“茶纹链”溯源应用	35
浙江大学蔡亮：区块链底层技术创新是关键	39
★公益慈善论坛	41
关于慈善研究，青年慈善学人在关注什么？	41
魏晨：如何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硬体、软体和韧体？	45
郑功成：慈善无国界，但慈善事业有国界	52

★山商实践探索	54
正确认识公益慈善	54
财商教育初探	62
世界的本来面目：我读《“错误”的行为》之一（1）	69
★学术资源推荐	74
图书推荐	74
论文推荐	76

主办：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 主编：崔洪海

责任编辑：陈浩义 排版设计：李嘉乐 封面摄影：崔洪海

★财富管理论坛

过渡期延长后，监管对银行理财存量整改有哪些要求？

近日，备受关注的资管新规过渡期是否延长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为平稳推动资管新规实施和资管业务规范转型，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审慎研究决定，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至 2021 年底。客观来看，过渡期延长是在不改变资管业务转型方向与监管标准的原则下，综合考虑了疫情冲击、宏观环境、市场影响、实体经济融资等现实因素，做出的一个重大的适应性调整，为当前形势下平稳推进资管存量业务整改、培育规范的资管行业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新规过渡期延长后，金融机构需要认真落实新规要求，统一认识，在过渡期内完成存量化解工作，进而推动净值化转型。为此，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CWM50）于近日召开“落实新规延期政策 扎实推动存量化解”专题研讨会，邀请邀请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金融机构代表及专家学者等，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交流，为平稳有序推进存量资产整改、加快推动资管业务转型建言献策。



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银保监会创新部副主任蒋则沈、银保监会资金部副主任郝永春、证监会机构部副主任林晓征等监管部门领导出席会议，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及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代表在会上发言。会议由中国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主持。

孙天琦局长首先从中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提出对落实过渡期安排和促进资管行业健康发展的看法。

他表示，从中短期来看，行业的首要任务是在 2021 年底前，按照过渡期安排积极落实整改。金融机构是整改工作落实的第一责任人，金融管理部门要做好

配套政策安排，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从长期看，要从强化微观审慎监管、完善行为监管体系、落实功能监管要求方面着力做好相关工作。

微观审慎监管方面：一是严格准入管理，必须持牌经营，要关注部分财富管理公司和境外机构“无照驾驶”的情况；二是强化流动性管理，落实“三单”要求，杜绝资金池运作，防止风险积累扩大蔓延；三是做好风险隔离，严肃市场纪律，切实打破刚兑，真实还原计量资本；四是简化投资层级，规范杠杆约束，防范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五是控制标的资产的集中度，分散投资风险，避免引发连锁反应。

行为监管方面：一是健全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资管行为准则，明确“卖者”应尽的责任，打击欺诈误导；二是有效开展投资者教育，普及“买者”自享收益、自担风险的理念；三是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功能监管方面，要深刻吸取教训，上下不推脱，左右不推脱，进一步促进同类产品监管标准、行为准则的一致性，不留监管盲点。

蒋则沈副主任介绍了银保监会对银行理财存量整改工作的要求和推进情况。他表示，综合前期各商业银行反映的共性问题，银保监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存量处置工作细化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措施，既保持战略定力、坚守风险底线，同时注重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大局，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对于机构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蒋则沈副主任从三方面进行了回应。第一，存量处置既有常规性的“一行一策”，在常规化存量处置措施穷尽之后，也有个案处理政策。第二，从资管行业转型角度看，早一点卸下包袱，有利于早一点轻装上阵，银行理财才能真正发挥优势，行稳致远。第三，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核心定位，应该是投资管理能力，而不是来自于制度优势，否则不利于子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塑造和长期健康发展。

林晓征副主任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资管业务规范整改情况及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一年工作安排作了介绍。她表示，资管新规发布以来，证券基金经营机构有序推进规范整改，总体进展顺利，下一步将主要从四个方面推动落实存量整改和新业务规范发展：一是压实机构合规风控主体责任；二是按照“扶优限劣”的原则，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配套措施；三是协同加强监测分析，形成监管合力；四是坚持回归资管本源，紧紧围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财富管理需求，支持新业务规范发展。

林晓征副主任还对机构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了回应，她认为，资管新规实施近两年半以来，各方就诸多问题达成共识并付诸实践，工作成效是显著的，下一步，建议一是夯实机构主体责任，切实落实资管新规过渡期监管要求，协调处理好新业务规范发展与存量业务整改的关系，主动稳妥有序推进整改。二是加强协同，一方面，增进机构各业务及环节之间的专业协作，畅通投融资体系，引导

更多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持续增进机构与监管之间沟通以及监管之间的协同，共同推动我国资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郝永春副主任在会上表示，保险资管整改进展相对顺利，截至今年5月末，待整改规模约2400亿，其中通道类产品1400亿，多层嵌套产品约670亿，期限错配产品300亿，存量整改工作相对压力不大。他指出，保险资金和银行理财在存量整改方面既有相似性，也有互补性。保险资金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或长期投资等方式对银行理财的整改和存量化解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在资管业务发展方面，他指出，传统银行、保险业务一方面以较大的利差保护可能发生的损失，另一方面有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证基金等政策的支持，而资管业务可以得到的利差相对较少。因此，资管业务除了做好风险防控之外，还要关注能力建设，只有当资管业务的投资能够帮助社会创造价值，它才能够持续地发展；资管业务不应仅简单地合规经营，更要在管理好风险的前提下，切实做到靠能力建设，靠创造价值来防患于未然。

与会的银行机构代表包括工银理财专家赵柏功、农银理财总裁段兵、建设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鲁秀艳、中银理财副总裁孙新夏、招银理财首席风险官方凌、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光大银行首席业务总监、光大理财董事长张旭阳、兴银理财总裁顾卫平、民生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昌林、平安理财首席财务官李岩、华夏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苑志宏、北京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季雨、杭银理财总裁王晓莉，以及与非银机构代表天风证券副总裁翟晨曦、鹏华基金总裁邓召明、华能信托总经理孙磊、蚂蚁金服研究院研究总监林晨等先后发言。

与会代表对资管新规延长一年过渡期的政策表示高度认同，并对新规延期背景下如何更好落实政策要求，推动存量化解提出相关建议。大家认为，资管新规延期一年，是监管机构保持政策定力、尊重市场规律、有效平衡促转型和防风险关系的一个科学举措。各机构将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详细的整改规划，并按照监管要求落实执行。

在此基础上，与会代表也提出了一些相应建议，如：希望进一步明确非标转标的可行路径、适度提升存量产品中配置的高流动性资产占比、建议允许新发产品承接存量资产、对于积极主动按时完成回表的机构给予政策激励、存量资产回表过程中允许商业银行通过发行资产抵押证券的方式来募集资金、调整资本补充工具的会计认定和属性认定、建议放松对现金管理类产品规模上限的限制、加快银行数字化转型、推动行业内和跨行业合作、进一步加强监管协调、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等。

监管部门领导最后对与会代表提出的建议给予了点评与回应。

来源：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HPIQ2SvLJVgxb88gdfHMzg>

信托行业财富管理业务未来发展的思考

一、以深化客户关系为核心，夯实业务基础

信托业各家机构因发展战略、股东背景、产品特点的差异，在财富管理客户结构上各有特点，如：中信信托凭借行业龙头优势，在多家代销渠道均有产品上架的同时直销占比亦不低；外贸信托重点与招商银行开展合作，同时通过品牌建设和产品丰富打造了优质的直销客群；建信信托主要依托建行系统，基本以代销为主，直销客户以机构居多；上海信托在银行系信托公司中直销能力突出，在江浙沪地区有稳定忠实的直销客户群。

从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路径来看，几乎都起源于高收益产品直销，投向地产、城投、工商企业债权，以固定收益为主，整体而言产品丰富性较为欠缺；随着监管要求变化、行业经营变迁，传统的信贷类产品规模料将迅速下滑，在信托产品推陈出新的同时，培育一批风险识别能力强、客户关系稳固的客户群体至关重要。带着客户一起转型，帮助客户尽快适应新时代资产配置的变化和产品的变迁，是财富管理机构的首要任务。

二、做好客户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

信托公司机构和人员设置较为集约，无法像商业银行设置各类客户关系管理部门，主要由财富管理业务板块统筹公司各类资金客户，包括自然人、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客户。此三类客户需求差异较大，自然人客户注重公司品牌和产品收益，对期限、项目主体、风控措施要求不高；金融机构客户一般设置各类白名单，内部信评标准高于产品外评情况，较少投资民营经济，产品期限跨度较大；工商企业客户偏好一年内短久期资产，更为注重产品安全性和流动性。不论是采用分设部门开展营销亦或财富管理中心整体营销模式，建议综合衡量客户资产规模、在司时长、利润贡献等，通过分层分类在最底层均匹配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人员，激励客户自主升级，不断提高贡献度，用真正专业的产品和服务支持行业发展，尽早打破“刚兑”魔咒。

三、通过家族信托提升财富管理内涵

银保监会 2018 年发布的 37 号文对家族信托进行了界定，明确家族信托不属于资管产品范畴，是信托本源业务，不适用于资管新规要求。家族信托作为信托机构有别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的特色业务品种，在制度设计、资产安排、需求满足等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信托机构应发挥家族信托制度特色，从高净值客户需求出发，设计模板类和个性类两类业务模型，除金融资产外，考虑与专业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不动产、股权等全口径统筹管理服务，从财富管理迈向家族治理、家族事务管理与家族慈善。

四、以丰富而多样化的产品为工具

2020 年 5 月 8 日，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新规与 2018 年

4月出台的“资管新规”一脉相承，旨在促进资管市场监管标准统一和有序竞争，促进投资者权益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监管近年来孜孜以求的政策导向，即信托业要服务实体经济，回归本源业务，严守风险底线。与之前的监管要求相比，新规重点内容包括非标债权额度和集中度要求、合格投资者要求、投资股票集中度要求、关联交易额度和比例要求等。新规坚持信托产品私募定位，坚持非标限制，杜绝监管套利，引导信托公司由类信贷、非标准化债权模式转向股权投资和标准化债权模式，回归财产转移和财富管理功能定位，保障信托产品投资者利益。在此背景下，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产品转型迫在眉睫。

丰富产品类型配置。信托牌照有着天然最为完美的制度优势，能够进行各种资产配置安排。各家信托公司发展初期均以地产业务为主，建议在一级股权市场、一级半定增市场、二级市场中寻找各种机遇，在标准化产品、非标产品、现货市场、期货市场等多个维度或自行开发产品，或与优质的资管机构合作开发，借助其他资管子行业的经验和优势加速信托产品发展。

灵活应对客户定制需求。新规明确信托产品为私募产品，私募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定向发行、个性化、可定制。建议未来在信托产品规模和内部决策流程上增加灵活性，特别是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慈善信托等服务类信托，更应注重产品专属性，及时应对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真正发挥信托牌照优势。

五、以专业成熟的服务团队为智囊

随着新规的推出，未来信托产品将丰富多彩，而目前的营销人员在专业储备和营销经验上整体而言较为单一。一方面须筛选直销经验丰富的部分客户经理，专职负责直销客户和产品工作；另一方面补充引进熟悉资本市场的优秀资深客户经理，并建立团队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同时，差异化营销团队工作职能，结合营销人员自身经验和主观意愿，对业务门类、不同条线进行人员细分，将各项职责明晰区分、落实到人。此外，着重加强客户经理金融专业和职业素质培养，提升各条线的信息互通联动性、行业研究能力，能够深入了解、掌握更加全面详细的产品细节，满足客户各类的需求。

六、以便利的现代化科技手段为支撑，优化客户识别、评估、签约等环节，实现高效精准销售

目前各家信托公司均上线了APP认购系统，主要面向自然人客户，极大地便利了销售流程。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体系中的系统建设在客户关系管理、合格投资人认定、反洗钱、数据分析等方面仍在起步阶段，将营销全流程嵌入系统，实现完全电子化客户管理和销售管理，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此外，针对金融机构客户、企业客户的系统建设亦应提上议事日程，可通过外部合作方式加快落地进程。

作者：梅贞，吕博

来源：未来财富管理知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hFdIecOXQV_N6kLPZiggOg

中国家族企业迎来传承期，揭秘“继承者”背后的家族办公室

让财富与时间相安无事，才是传承。自古以来，“富不过三代”像魔咒一样困扰着财富家族。上一代人辛苦打拼的事业，往往延续不到几代就消耗殆尽，如何基业长青是财富家族们的一门必修课。

一、老一代企业家步入传承路口

酱料行业巨头李锦记曾因家族继承遗留问题，两次让企业陷入经营风波。

1922年创始人李锦尚去世后，他按照传统的传承方式，将企业经营权平分给了三个儿子。

经历了几十年“小富即安”的生活后，三儿子李兆南想改变经营方式，通过获取更多中低端市场份额的方式，扩大企业规模。但这一想法遭到大儿子李兆荣和二儿子李兆登的反对，双方产生激烈分歧，几次要对簿公堂，最后是李兆南收购了两位哥哥的股权，才得以平息争执，让公司继续发展壮大。

到了第三代继承人，李锦记又再次经历了相似的传承危机。李兆南的次子李文乐在病重时提出与大哥李文达分家，并决意变卖股权。李文达为了不让公司分崩离析，费尽心思说服弟弟收购了他手里的股权，才保住了家业。但巨额的收购支出让公司一度陷入财务困境。

从李锦记经历的两次危机可以看出，企业家族传承并不仅是简单的个人财产分配，还混杂着企业资产、企业未来经营发展等问题。如果企业创始人与继承人没有妥善处理好其中的复杂关系，让家族矛盾或个人状况影响企业运转，企业家历经半生风雨成就的家业，很容易在传承中夭折。

李锦记所经历的传承问题只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在或即将面临类似的家族传承问题。

改革开放42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飞跃式发展，从底子薄弱的人口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中创造了“中国奇迹”。与此同时，国内涌现了许多财富飙升的企业家。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有逾2700万家民营企业，其中超过80%为家族企业。随着企业创始人年龄增长和经济发展环境变迁，处理一代和二代交接传承问题，成为不少家族企业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12月24日，平安私人银行联合福布斯中国发布《2020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经过深入调研和访谈，揭示了国内财富家族的传承现状和痛点。

《白皮书》显示，过去5年上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财富翻了两倍多，即便是在疫情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下，也有近2/3的上榜富豪财富继续逆风增长。此次参与《白皮书》调研的上榜富豪平均年龄为43岁，可以看出，他们在未来都有财富传承方面的需求。

另有《白皮书》引用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增长了5倍，个人持有资产总体规模达165万亿元。庞大的财富需要极其专业和智慧的团队来为其进行统筹和规划，这也推动着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

为避开老一辈企业家在家族传承中走过的弯路，不少知名企业家已经开始用更高端和全面的服务，来减少家族传承中会遇到的未知风险。



▲福布斯2016-2020年中国富豪榜总财富值变化

海底捞上市后，创始人张勇及其妻子舒萍身价大涨，二人于去年在新加坡成立家族办公室 **Sunrise Capital** 管理财富。万达创始人王健林给儿子王思聪成立的普思资本，也是以用家族财富对外投资和处理家族事务为主要职能的家族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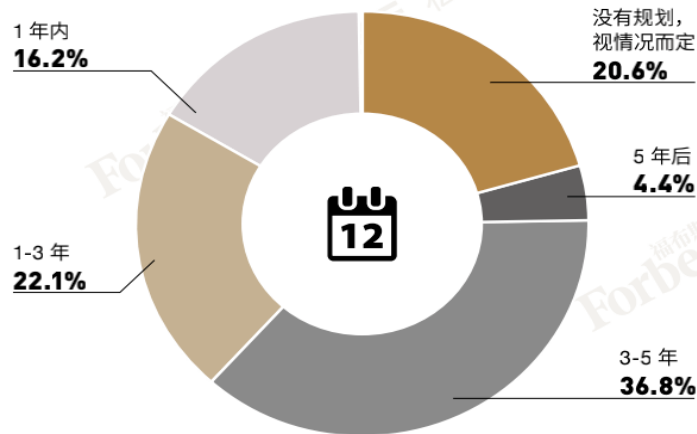
这种在 2015 年前后在国内开始兴起的家族办公室，是目前家族财富管理领域的最高形态，通常有家族内部设立和外部专业机构设立两种形式，可以提供全方位的财富管理和家族事务服务。

除了传统的财产信托工具外，家族办公室服务通常还涉及企业管理、遗产规划、日常财务规划、法律税务、家族文化传递、继承教育等多个领域。

《白皮书》调研显示，在我国多个类型的家族办公室服务中，最受财富家族青睐的是商业银行提供的一体化家族办公室服务，其次为独立组建的单一家族办公室。

二、“解决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白皮书》调研还显示，目前国内尚未使用家族办公室的参与者中，有超过 70% 的人表示，将在 1-5 年内考虑使用家族办公室业务。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潜在客户，是因为家族办公室能帮助企业和家族解决综合化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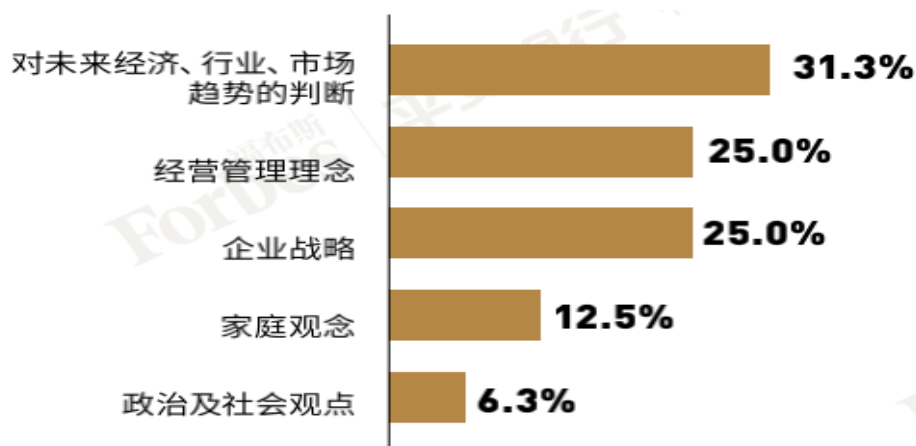


▲考虑建立家族办公室或使用家族办公室服务的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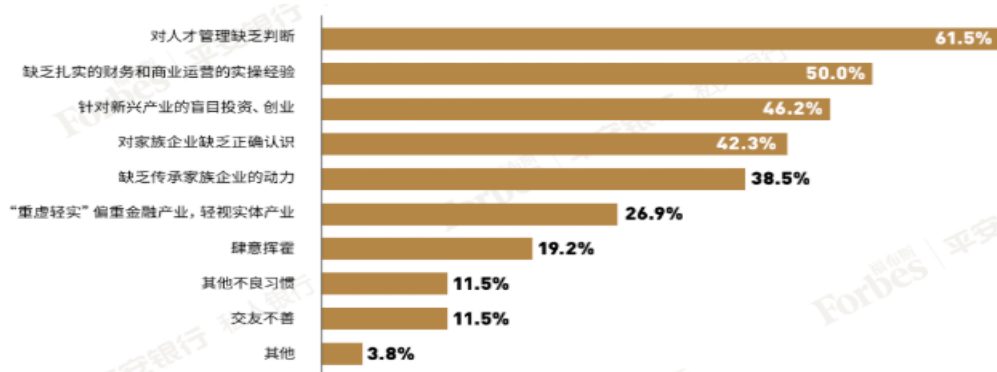
如一位《白皮书》调研受访者所说，他们希望得到管家式的服务，为他们解决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平安私人银行发布的《白皮书》显示，目前财富传承和家族管理的痛点主要集中在家族继承人、财产隔离、家族治理及法律税务四个方面，这些问题既错综复杂，又具有较强的专业领域属性。

在调研中，有超过 60%的参与者表示，家族继承人目前在未来经济、行业、市场趋势判断、企业战略以及经营理念上与整体家族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令一代创始人们担心继承人识人不清，并在缺少扎实的财务和商业运营实操经验的同时，会进行盲目投资。



▲家族继承人与家族的观念分歧；



▲财富家族担心的继承人培养问题

当家族内部出现纠纷或矛盾时，有近 80%的调研参与者表示，没有统一的规范或治理机制来处理 and 协调，多是根据情况商议解决或直接由家族领导人来决定如何解决。

在家企业财产方面，当前国内财富家族的财富构成主要是房地产等固定资产、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和企业股权，这些资产占比达 70%以上，其他如艺术品、汽车和葡萄酒等实物资产占比仅有 30.2%。在财产构成较复杂的情况下，有近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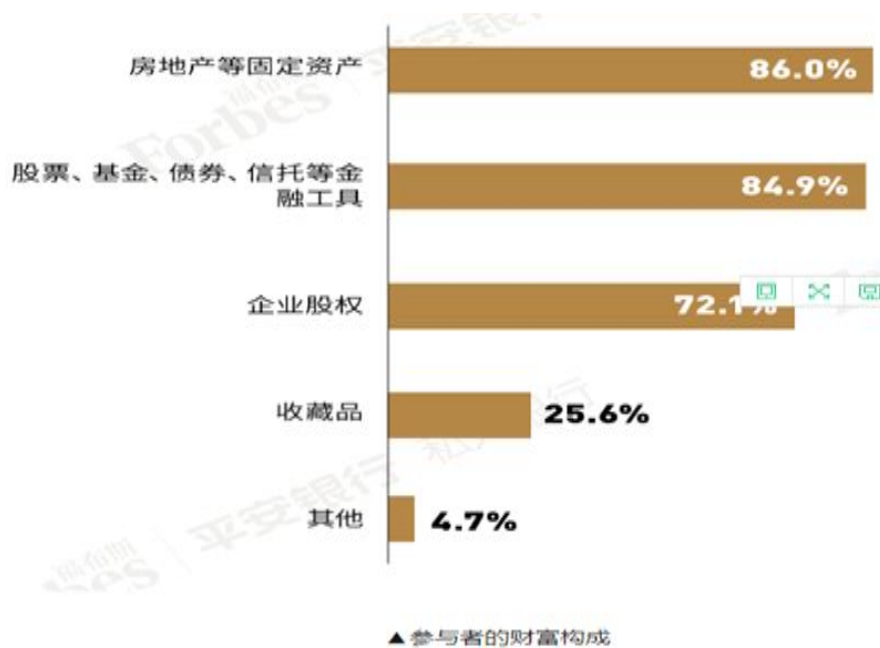
的调研参与者表示，还没有对企业和家族财产界限进行分割或风险隔离。

当家族创始人去世时，继承人需要对其遗产进行缴税后才能进行合法继承，财富值越大应纳税额越高。三星第三代继承人李在镕就面临 10 万亿韩元遗产税待缴纳，他曾尝试通过对三星进行重组的方式减轻遗产税负担。国内财富家族也有相同需求，55.6%的调研参与者表示，征收遗产税会对其财富传承方式带来影响，迫切需要相关税务建议。

除了这些固有硬性问题，影响经济和日常生活的突然情况出现后，还会带来新的问题。

新冠疫情发生后，财富家族对子女教育规划、身份规划、健康管理、出行规划等非金融方面的需求增加。多位福布斯富豪榜上榜企业家表示，遇到疫情这种突发状况，孩子的出国留学规划被打断或因疫情无法回国，都需要用一些他们平时不了解的方法或资源来解决。

上述需求，要求家族办公室能像守门员一样，在任何情况发生时，为家族成员守护家族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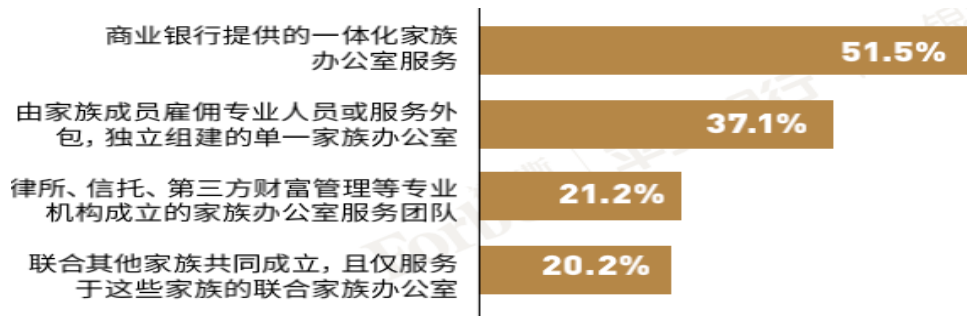


三、市场竞争者众多，商业银行最受青睐

在家族办公室潜在需求增长的背后，是国内家族财富管理市场崛起的新蓝海。

在此背景下，家族财富管理市场内引来了众多参与者。目前国内设立家族办公室服务的机构，既有商业银行和信托机构，也有律所和其他第三方财富管理等专业机构。形形色色的参与者让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变热闹的同时，也出现了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不少机构名义上是家办家族办公室实为卖金融产品。

在诸多参与者中，商业银行是专业性和综合能力做的更好的机构。调研中，有 51.5%的人表示，商业银行提供的一体化家族办公室是他们认知中最为青睐的家族办公室形式。



▲未使用家族办公室的家族最青睐家族办公室形式

平安私人银行发布的《白皮书》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商业银行具有更强的业务整合能力、与客户间更好的信用基础及更具影响力的品牌效应，而专业可靠的财富传承服务、隐私保护，和具有综合金融优势是被调研者最看重的三个衡量标准。

这些特质，让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平安私人银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近年来，平安银行基于外部趋势与自身禀赋，提出了“成为中国最卓越、全球领先的智能化零售银行”的发展愿景，自2016年转型大幕拉开以来，发展迅猛。其中平安私人银行业务更是成绩斐然，截至今年三季度，私行客户近六万、资产管理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迈入了中国私人银行业第一梯队。

国内商业银行众多，平安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有哪些优势呢？”

作为平安银行和平安集团的重点业务，两大平台为平安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提供了雄厚的资源基础，懂客户所需，不断探索创新业务，持续为客户输出定制化、专业化及全面解决方案，为超高净值客户提供一站式传承及全方位财富管理服务。

除可以涵盖财富家族在金融和非金融两方面需求外，还可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外部机构，提供家族全生命周期服务。此次疫情中，平安私人银行不仅及时根据市场变化为客户提供了有效的资产管理建议，还为有需求的客户在短时间内设立了防疫专项慈善信托业务。

科技硬实力是平安私人银行的另一大优势。

平安私人银行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家族信托在不同类型的超高净值客户心中都是最具全方位风险防护能力的家族财富传承工具，也是参与者会优先使用的婚姻风险防范工具。而目前家族信托业务还主要依赖人工操作，存在投资效率不高、风险披露不全、下单过程缺乏留痕等问题。

平安私人银行通过科技赋能，对传统传承工具进行革新，在业内率先实现家族信托投资配置全流程线上化，将家族信托资产投配效率、操作安全性、信息传递即时性大幅提升，显著提升客户体验。

平安银行行长特别助理蔡新发在致辞中这样写道：“这份《2020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希望能成为中国式家族办公室发展的里程碑，为中国家族解决全

生命周期的财富规划、家业传承、公益慈善需求，为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优良家风国风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家族企业的转型升级与传承发展，不仅是企业个体的发展问题，还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白皮书》指出，相信随着中国家族“一代”向“二代”的过渡，中国企业家家族将会把家族办公室与家族财富和家族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尽早落实家族财富传承的安排。家族办公室服务在巩固民营企业经营信心、引导私人财富向善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将更加凸显。

发布《白皮书》的平安私人银行表示，致力于打造“更懂中国人的家族办公室”，希望向全社会普及家族传承理念，让家族办公室服务切实走进中国财富家族，助力更多中国家族“平安传家，传承平安”。

作者：三川

来源：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441523965_699376

国内资管机构研究体系分析

一、国内不同类别资管机构一般研究体系特征

1. 银行资管

资管新规前，银行理财产品以预期收益型为主，其首要目标是保证收益的兑付，面临的风险大多为信用风险。所以，银行的研究体系是以信用风险研究和信用风险管理为支撑搭建起来的。而资管新规出台后，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单纯的信用风险研究已不足以支持其多元化的产品发展需求。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目前银行理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固定收益类资产方面。虽然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已陆续组建了覆盖策略研究、行业研究、品种研究、管理人研究、基金研究等内容的大类资产研究框架，并推出了不少创新型产品，但整体来看，商业银行并没有构建起覆盖全资产类别和投资策略的研究体系。

2. 信托资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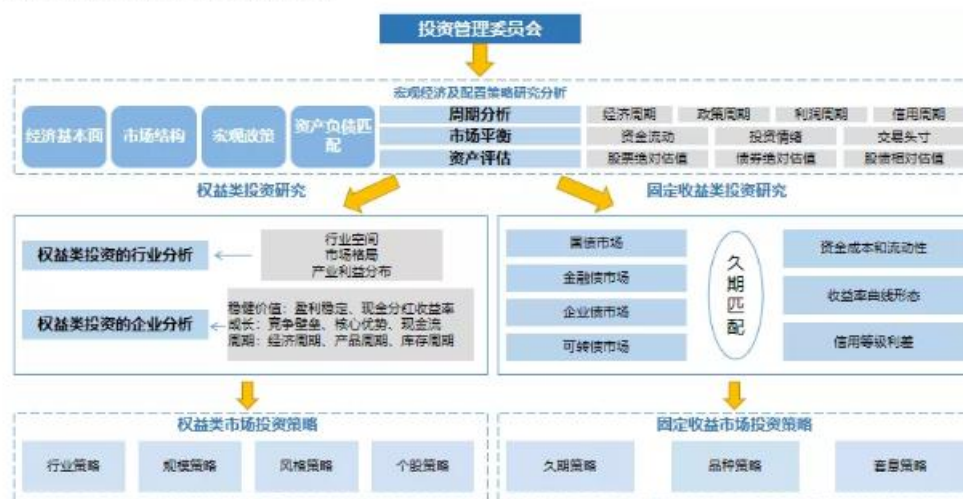
在《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前，信托公司的投研优势集中于非标资产方面，而在标准化投资领域涉足较少。虽然现在非标投资受到严格限制，但信托公司研究体系的标准化转型并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的。目前，大多数信托公司的研究体系仍以非标资产研究为基石。

3. 保险资管

基于保险业务较长的周期，服务于保险业务的保险资管更看重对于大类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的研究。部分保险资管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研究体系，组建了多个研究小组，研究范围涉及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债券研究、投资策略研究、行业研究、利率研究、量化研究等。同时，强调系统化的研究体系，如股票研究体

系主要由宏观研究、行业研究、公司研究及策略研究构成。以基本面研究为主，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如阳光保险资管，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框架，注重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和国际化的研究视野。

图1：阳光保险资管研究体系框架



资料来源：阳光保险官网

4. 券商资管

不少大中型券商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在宏观、策略、固定收益、金融工程、行业、中小市值公司等研究领域为客户提供研究服务。券商资管借助母公司在卖方研究和投行领域积累的深厚经验和强大投研能力，形成了覆盖各个行业和研究方向的研究体系。

如中金研究院致力于培养覆盖全球宏观经济、全球投资策略、全球大宗商品以及金融、科技、传媒和互联网、房地产、能源、材料、工业、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全方位研究能力。在产品研究方面，中金公司财富研究部目前形成了涵盖阳光私募、基金专户、封闭式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定向增发基金、固定收益产品等各类产品线的研究体系，为其业务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5. 公募基金及私募基金

公募基金以获取绝对收益为目标，在宏观研究、行业研究、微观研究、权益研究等方面均有较为丰富的积淀，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体系。

私募基金管理人众多，且不同管理人研究方向不同且能力相差较大，但总体上来看，私募基金更加注重灵活性，并在权益类资产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优势。

二、国内外资管机构研究体系主要区别

国内外资管机构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不同。国外先进资管机构大多建立起了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以“专业化”作为品牌形象。例如瑞银集团的瑞银财富管理下设的首席投资办公室，此部门由有百余名经济学家、研究员、策略分析师等专家组成，负责寻求投资机会、检测市场风险，并提供投资建议，为大类资产配置研究和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摩根大通仅资产管理板块就配备了

30 名市场策略师，负责通过宏观研究提供大类资产配置建议，此外，研究部门还有超过 250 名研究员对涵盖全资产类别的基础资产进行研究。

在激励机制方面，国外先进资管机构的激励机制更加健全和有效。以摩根大通资产管理为例，其短期激励主要由员工基本工资构成，而长期激励则分为上限为每年 100000 美元的现金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基于配股的长期激励计划、限售股单元激励计划、绩效股单元激励计划等组成部分。再如瑞银集团，自 2014 年起，瑞银集团员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就已超过 50%，截至 2019 年，此比例已超过 55%。

国外资管机构投资策略研究更加全面，而国内资管机构投资策略研究方向较为集中。在投资策略多样性方面，摩根大通策略库包含多达 500 个备选策略，能够根据客户需求为全球范围内的客户量身定制金融服务。相比之下，国内资管机构，尤其是银行系资管机构的策略研究方向虽然有所突破，但目前仍集中于信用债、量化策略、组合基金等领域。

国内外资管机构金融科技研究进展不同。随着信息技术由电子化、信息化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金融科技已逐步渗透到资管行业的方方面面。国际先进资管机构充分开展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资管领域的研究运用，推动资管行业向智能投顾、智能投资发展。如贝莱德于 2000 年开发出的阿拉丁系统已经成为贝莱德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标签，该系统也得到众多国际一流资管机构的肯定。瑞银在 2012 年开始着手布局数字化建设，其在科技领域资金投入占到集团收入的 10%，2017 年已拥有超过 2 万名技术人员。相比之下，虽然国内资管机构在金融科技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但头部资管机构的金融科技研究发展较快，而部分中小资管机构对于金融科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

三、国内资管研究体系的发展方向

拓展研究范围，形成覆盖宏观、行业、固收及策略的全方位、立体化研究体系。以宏观研究指导行业研究，并由行业研究验证宏观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同时，借助宏观、行业以及微观研究为策略研究及产品研究提供支持，进而为最终的投资决策服务。完善有效研究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时间持续性的尝试和改进，故资管机构可以在短期内通过与同业合作，借助同业的投研力量来推动自身研究能力的成长。如银行系资管机构可通过与公募基金资管机构合作，在自身固收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借鉴学习公募基金资管在权益研究方面的经验。

借助数字化推进金融科技研究。资管机构可借力数字化强化金融科技研究，丰富研究体系框架，进而利用金融科技研究成果为产品研究、大类资产配置研究、信用风险管理研究等提供支撑，推动研究体系的稳健发展。

作者：郑哲涵

来源：未来财富管理知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MCBqzy61-Ev8RzPJjIE1w>

《民法典》继承编对私人财富管理有何影响？

一、民法典的颁布背景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需要更加符合当前客观规律、体系严密，以达到“良法善治”的目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据此，我国以2002年的民法草案和此前制定的婚姻法、收养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为基础，重新编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于2020年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自202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民法典》是我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涵盖公民生老病死的全部生活层面，其中蕴含的权益义务理念和相关制度将每一个家庭的财富管理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民法典》继承编中对于遗产的管理和分配的若干规定，将给私人财富传承带来不可忽视的变化。

二、民法典继承编的主要内容

《民法典》继承编与过去的民法继承制度相比存在多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民法典》顺应时代发展，新增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效力，废除了公证遗嘱优先的地位等；另一方面，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并从法律层面明确遗嘱信托的法律关系，与遗产管理人相衔接，大大提高遗嘱信托的可操作性，为财富传承中开展遗嘱信托扫平了道路。

表1：民法典继承编的重要内容变化

《民法典》继承编的主要内容	
新增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	《民法典》继承编保留了继承法原有的五种遗嘱形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新增两种法定遗嘱形式：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并在第1136和1137条中对两种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予以了明确规定。
设定“遗嘱最新第一”原则	在原继承法中，赋予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地位。但新《民法典》第1142条仅规定，各种遗嘱效力平等，数份遗嘱有冲突的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扩大代位继承人范围	《民法典》第1128条第2款中的规定，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但这种扩大仅指被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时，第二顺序继承人中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其应继承的部分。
新增遗嘱人宽恕制度	《民法典》新增了继承人宽恕制度，除了故意杀害被继承人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两种极其严重的行为外，对于其他行为，继承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再丧失继承权。
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	《民法典》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并对遗产管理人的选任、指定以及职责等均进行了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的协调可以有效减少各方争执，满足多元化遗产分配需求，利于社会稳定。
确立遗嘱信托的法律地位	《民法典》继承编在第1133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同时根据《信托法》，设立遗嘱信托必须通过自书、代书、打印、公证遗嘱的方式进行，不可采用口头形式。）

三、新民法典对私人财富管理的影响

提前做好财富传承规划的重要性凸显。财富传承是私人财富管理的重要内容。《民法典》继承编的变化总体上给财富人群提供了便利，但无论是哪种变

化，都避免不了出现因遗产纠纷而对簿公堂的情况，因此，无论是普通客户还是高净值客户需提前做好财富规划，避免后续纠纷。在财富传承工具的选择上，普通客户可主要选择遗嘱继承的方式，做好现金和非现金的资产安排；而高净值客户还可以选择大额保单、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等具有财富传承功能的财富管理产品，在避免遗产纠纷的同时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专业机构在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民法典》中新增的遗产管理人制度，进一步明确了专业机构在高净值家族财富代际传承中的法律主体地位，从制度上确保了私人银行、信托、律所、家族办公室等各类财富管理专业机构可以以遗产管理人的身份更好的发挥家族财富跨代管理中的作用。而由于高净值客户的家庭财产往往具有分散、形式复杂多样、债权债务管理交错等特点，在新《民法典》继承制度框架下，高净值客户将更有动力寻找专业机构进行财富传承管理，这都将给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者：康箐芸

来源：未来财富管理知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3ZUIcn7jWFZZ5ygWlrjrCg#>

数字经济进入“算力时代”

2021年1月21日，瞭望智库联合莫干山研究院在京举办发布会，正式推出《赋能数字经济拥抱算力时代》课题研究报告（下称“报告”）。该《报告》由瞭望智库和莫干山研究院共同发起，在多个国家部委相关领导的指导下，在数字资产研究院、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北京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旨在梳理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探究相关产业链各环节呈现的新特征，总结算力为经济社会带来的新变革，寻找政产学研用各界协作新模式。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多年持续深入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有了全新的内涵和发展范式，各行各业开启全面数字化，深刻影响社会生产生活，促进全球经济格局重塑。

目前，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普通经济的3.5倍，数字经济投资回报率更是非数字经济的6.7倍。数字经济正在经历高速增长、快速创新，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其他经济领域。一个以计算能力为基础，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化数字经济世界，正在加速到来。

一、新计算：从“工具”到“能力”的蜕变

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万物互联的数字智能社会，伴随人类智慧进步的需求，计算工具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手动到自动、从自动到电子的发展过程。

万物互联时代下，全球信息数据总量爆炸式增长，算力成为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传统摩尔定律失效，单一IT架构无法满足激增的算力需求，对

算力的合理利用和不同计算单元的协作变得日益重要；多元化的场景应用和不断迭代的新计算技术，推动计算和算力不再局限于数据中心，开始扩展到云、网、边、端全场景，计算开始超脱工具属性和物理属性，演进为一种泛在能力，实现新蜕变，我们称之为“新计算”。

形态/阶段	标志性事件
手动式计算	绳子、石子； 算筹、算盘； 对数计算尺。
机械式计算	1642年，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利用齿轮技术，发明人类第一台机械式计算工具“帕斯卡加速器”； 1673年，德国数学家发明“四则运算器”； 1804年，法国机械师约瑟夫·雅各发明可编程提花机，创造穿孔卡片这一输入方式，为机械式计算进步奠基； 1832年，英国数学家巴贝奇发明差分机，采用有存储、运算、控制三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装置，人类从手动机械进入自动机械时代。
机电式计算 (以机电式计算机为主)	1886年，美国统计学家赫尔曼霍勒斯借鉴穿孔卡片原理发明制表机，可自动进行字则运算、累计存档、制造报表； 1938年起，德国工程师朱斯采用继电器，研制出人类二进制计算机 Z-1、Z-2、Z-3、Z-4； 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数学教授霍华德·艾肯使用大量继电器，发明机电式计算机 Mark-I。
电子计算机	1939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数学物理学教授阿塔纳索夫 (John Atanasoff) 及其研究生贝利 (Clifford Berry) 用电子技术来提高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研制出 ABC (Atanasoff-Berry Computer) 电子计算机，为模拟计算向数字计算的跨越奠基； 二战期间，“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发明“图灵机”模型，为数字计算机诞生奠定理论基础； 1946年，冯·诺依曼基于图灵机，发明第一台通用计算机、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 ENIAC，确立数字计算机整体机构，人类电子计算机进入数字的时代。
数字计算	继 ENIAC 之后，人类先后经历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三个阶段……

从技术层面上看，计算科学领域正在从传统的计算模拟与数字仿真，走向基于高性能计算与科学大数据、深度学习深度融合的第四范式；未来，内存技术、图计算、神经元计算、量子计算、拟态计算等新型计算技术将相继登上人类历史舞台。

从作用层面上看，伴随人类对计算需求的不断升级，计算在单一的物理工具属性之上，逐渐形成了感知能力、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思考和判断能力，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网、光纤网、物联网、云平台、近地通信等一系列数字化软硬件基础设施，以技术、产品的形态，加速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小到智能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大到天气预报、边界出行、医疗保障、清洁能源等民用领域拓展应用，都离不开计算的赋能支撑。计算已经实现从“旧”到“新”的彻底蜕变，成为人类能力的延伸，赋能数字经济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与传统计算相比，新计算具备四个特征：

其一，新计算是暴力计算。5G 的到来进一步加速万物互联，海量数据持续涌现，且数据结构从单一模式变为多模式，非结构化数据日益增加，新计算要满足对海量复杂数据的实时处理。比如，人工智能行业需要在短时间内对数据进行

更大规模的清洗、标注、训练，其本质就是暴力计算。

其二，新计算是泛在计算。数据在哪里，计算就在哪里。随着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大数据泛在分布于端、边、云。从本地计算的集群到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从边缘计算到端云协同，计算无处不在。

其三，新计算是协同计算。应用场景的复杂多样带来数据的复杂多样，要求多个计算技术、计算维度协同处理。

其四，新计算是绿色计算。通过大量采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系统作业等方式，新计算能以低功耗、高性能的并发处理能力，达到每比特成本最佳，芯片、硬件架构和应用能效比最优的目标。

总体来看，新计算面向的是万物互联、智能未来的发展需求。在传统计算要求基础上，新计算既要保障数据获取、存储、传输、计算、应用的自主创新，更要实现数据安全及治理的有力可靠，为数字经济提供可持续的支撑。

二、“算力时代”到来

算力并非新鲜事物，它指代了人类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也集中代表了人类智慧的发展水平。算力的大小代表着对数字化信息处理能力的强弱。

数字经济时代的“算力”，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综合体形成，主要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计算速度，芯片、服务器、计算机、超算系统都反映这方面的能力；二是算法；三是大数据存储量；四是通讯能力，包括 5G 基站多少、通讯的速度、延滞、带宽、可靠性、能耗；五是云计算服务能力，包括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的数量。

从产业需求来看，数据量与算力需求处于循环增强状态，数据量的不断增加要求更强的算力处理数据，同时哺育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训练、应用，这些技术的落地应用产生又催生更多数据、反过对算力提出巨大需求。

1992 年，全人类每天只产生 100GB 数据；今天全球 70 亿人，每人每天产生的数据高达 1.5GB，仅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一天就能产生 64TB 数据，足以填满 32 块硬盘。据 IDC 和 EMC 统计，近 10 年来全球算力的增长明显滞后于数据的增长。



以人工智能为例，据 OpenAI 测算，从 2012 年开始，全球人工智能训练所用的计算量呈现指数增长，平均每 3.43 个月便会翻一倍，计算量扩大了 30 万倍，远超过算力的增长速度。

一方面，摩尔定律放缓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数据量却在持续增加。图灵奖获得者 Jim Gray 提出“新摩尔定律”：即每 18 个月全球新增信息量是计算机有史以来全部信息量的总和。

超大规模的数据量对处理效率不断提出更高要求——没有强大的算力，数字经济将失去核心支撑。

从产业变革来看，科技革命驱动算力引发产业变革、突破发展天花板，推动数字经济向更高阶智能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起，美国迅速抓住计算机产业发展起步的机遇，掀起数字革命，缔造出强大的经济帝国，日本、欧洲等国家与地区紧随其后，同样成效巨大；过去 20 年里，互联网加速全球信息化改造，各产业企业深挖流量红利，通过迅速拓展用户数量带动市场效应高增长，为全球的数字化发展积累了深厚的基础。

但随着互联网渗透率不断提高，依靠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陷入瓶颈；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深入经济发展各个环节，从电商到社交、从 VR/AR 到自动驾驶、从人工智能到工业互联网……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优化还是新兴产业的孕育诞生，都需要依靠强劲的算力来适应新的行业变化与需求，完成从量变向质变的跨越发展。

换言之，此前数字化技术与算力的创新已为数字经济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当前仍只是数字经济的幼苗阶段，相较于数字经济的森林生态而言，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未来，算力与数字经济共促共进的关系将进一步强化：即算力不断发展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向前，数字经济持续向前加重对算力的支撑依赖，“算力时代”正在到来。

三、新计算产业正在成为数字经济核心驱动产业

区别于传统计算产业，算力时代的计算产业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多架构共存、多技术融合、多领域协同和多行业渗透的软硬件产业体系。

具体来说，“多架构共存”是指计算架构从单一 x86 架构扩展到异构处理器、人工智能处理器架构，不同计算单元的协作增强；基于不同行业不同特点，ARM、MIPS、Power、RISC-V 等各种非 x86 架构百花齐放；“多技术融合”表示，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统合，形成多种形式的运算能力；

“多领域协同”是指，计算从云端向物联网、边缘计算普及；计算无处不在，不同计算领域相互协同；

“多行业渗透”是指，超越 IT 产业本身，成为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多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适应算力时代对于算力的多元化需求，对应的产品和服务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在产业上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

一是异构、极致。针对数据“体量巨大、结构丰富、分布广泛”的特点，以多样性的处理器架构满足对海量数据的实时处理能力；

二是绿色、节能。以节能、环保为准绳的新技术，应对数据中心能源消耗问题，推动计算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泛在、协同。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多技术协同计算；需要政府、产业联盟、研发机构、开发社区等不同主体和组织相互联动、共同发展。

四是普惠、高效。提高每比特算力的应用能效比，降低使用成本，推动与各行业应用深度融合发展，让算力如电力一样触手可及。

具体到产业划分上，围绕算力，计算行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核心产业，一是外围产业：



核心产业是新计算产业的基础，属于 IT 产业，以软硬件的方式对外提供计算与服务能力。既包括传统 IT 产业中的处理器、服务器、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和基础软件等应用及相关服务，也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异构处理器、物联网、边缘计算等新兴的软硬件。核心产业中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机构将是未来算力时代的重要增长点。

外围产业是新计算产业中核心产业与行业应用相结合所催生出来的、满足业个性化需求的应用与服务，以服务 and 解决方案为主要内容：一方面提供满足行业需求的通用平台与服务，比如公有云服务、人工智能平台、大数据分析平台等；另一方面又推动实现新计算核心产业与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打造工业互联网、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与实体产业领域深度融合的解决方案。

作为算力的重要承载，新计算产业正在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产业。一方面，新计算产业链庞大，包括芯片、元器件、操作系统、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系统集成等多个部分，是数字经济下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新

计算产业是一切数字化应用建设及发展的源头驱动，有助于推动处于需求端的制造、交通、能源、医疗等多个行业突破瓶颈，提升生产效率，创新商业模式，优化用户体验，拉动产业增值，创造新的市场增长。

从长远来看，新计算产业发展前景极其广阔，新计算形成的产业群体和生态体系，会在持续赋能各产业数字化的同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加快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

来源：数字经济与管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LIPzj9Dp2IYHZDoFOJKaMA>

★财富管理报告

2020 方太·胡润财富报告



(2021年2月8日，上海)继1月28日发布《2021胡润至尚优品—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之后，胡润研究院今日携手方太联合发布《2020方太·胡润财富报告》(FOTILE·Hurun Wealth Report 2020)，揭示了目前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千万人民币资产、亿元人民币资产和3000万美金资产的家庭数量和地域分布情况，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这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12年发布《胡润财富报告》。

本报告中的“富裕家庭”为600万人民币资产家庭，“高净值家庭”为千万人民币资产家庭，“超高净值家庭”为亿元人民币资产家庭，“国际超高净值家庭”为3000万美金资产家庭。

报告除了公布中国拥有总财富600万人民币、千万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和3000万美金的家庭数量之外，同时也公布了拥有600万人民币、千万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和3000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家庭数量。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总财富代表这些人的信心，而可投资资产是金融机构最感兴趣的。”

2019年中国经济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和经贸摩擦持续等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国际背景下，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全年GDP增速为6.1%，实现年初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截至2019年底，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三大指数均呈现较大涨幅。其中，上证指

数上扬 22%，为 2014 年以来最佳表现；深证成指累计上涨 44%，创下 2010 年以来的近 10 年最大年度涨幅；创业板指比上年同期上涨 44%。另外，恒生指数全年上涨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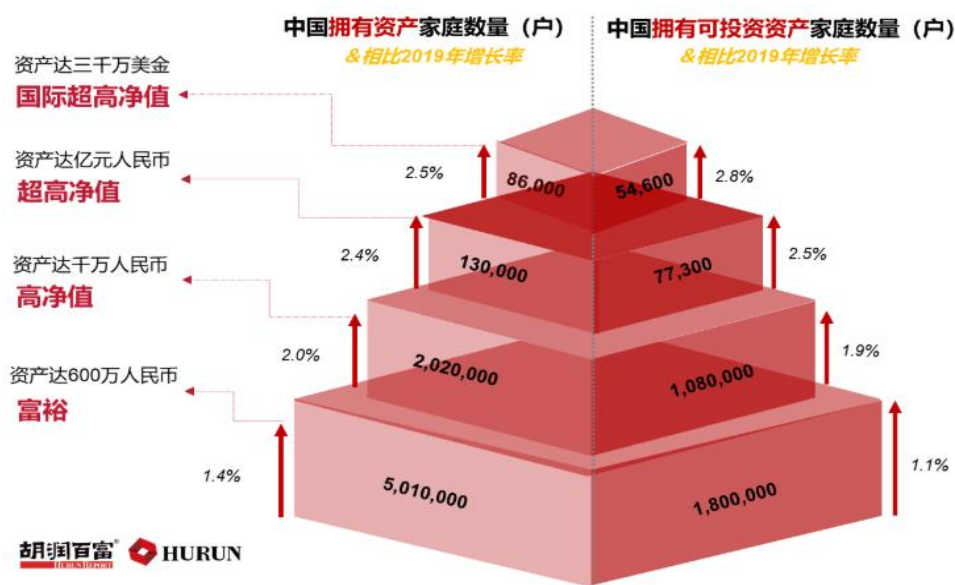
2019 年 12 月份，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3.8%，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7%；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7.3%和 6.7%，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3.7%和 3.9%。（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2020 方太·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 600 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总财富达 146 万亿元，是中国全年 GDP 的 1.5 倍，其中，中国内地占近九成。这 146 万亿元中，拥有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总财富为 94 万亿元，占比 64%，比上年扩大 4 个百分点；拥有 3000 万美金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总财富为 89 万亿元，占比 61%，比上年扩大 5 个百分点。

这 146 万亿元的总财富中，预计有 17 万亿元将在 10 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2 万亿元将在 20 年内传承给下一代，78 万亿元将在 30 年内传承给下一代。胡润表示：“企业家比较理想的是到 70 岁已经安排好了接班人。”

一、中国财富家庭规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拥有 600 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 501 万户，比上年增加 7 万户，增长率为 1.4%，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 180 万户；拥有千万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202 万户，比上年增加 4 万户，增加 2%，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108 万户；拥有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13 万户，比上年增加 3,000 户，增加 2.4%，其中拥有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7.7 万户；拥有 3000 万美金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8.6 万户，比上年增加 2,100 户，增加 2.5%，其中拥有 3000 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5.4 万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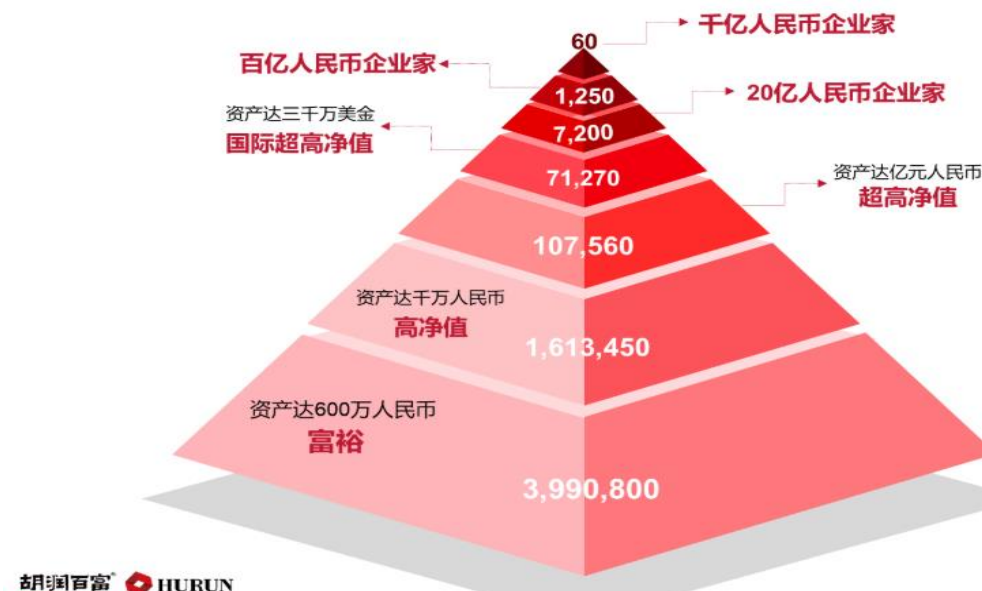
除港澳台之外，中国内地拥有 600 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 399 万户，比上年增加 6.8 万户，增长率为 1.7%，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 144 万户；拥有千万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161 万户，比上年增加 3.7 万户，增加 2.4%，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87 万户；拥有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10.7 万户，比上年增加 2,760 户，增加 2.6%，其中拥有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6.4 万户；拥有 3000 万美金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7.1 万户，比上年增加 1,960 户，增加 2.8%，其中拥有 3000 万美金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4.6 万户。

胡润表示：“中国高端消费者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他们消费能力很强，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中国内地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数量已经超过 160 万户，去年总消费规模达到 3 万亿元，千分之三的人口创造了 3% 的中国 GDP。他们所引领的消费趋势，三五年后，市场明显能看得到。”

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规模

600万人民币资产 “富裕家庭”数量	千万人民币资产 “高净值家庭”数量	亿元人民币资产 “超高净值家庭”数量	3000万美金“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	20亿人民币企业家人数	百亿人民币企业家人数	千亿人民币企业家人数
3,990,800	1,613,450	107,560	71,270	7,200	1,250	60

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规模



“我们财富报告是‘4X2’，即分为四个资产阶段：600 万人民币、千万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和 3000 万美金，每个阶段又分总财富和可投资资产，并且覆盖到中国近 100 个省市。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这份报告主要面向服务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机构和品牌，特别是投资理财机构和消费品牌，帮助他们梳理他们的客户群在哪儿最多。很高兴能与高端厨电品牌方太联合发布今年的财富报告。”胡润补充。

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分享：“疫情之下，消费者生活理念发生了巨大变革，高净值人群品质意识、健康意识同比显著提升，疫后主消费领域回归家庭，更加注重健康投资。此次方太荣获胡润百富高净值人群‘最青睐的高端厨电’奖，是对方太注重用户价值的肯定。一直以来，我们持续通过更健康、环保、有品味的产品来提升用户的幸福感，以技术驱动创新，以持续的研发投入，实现更高水准的产品重构与场景重构，推动行业、企业、消费者的美美与共。”

二、中国财富家庭地域分布

1. 600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分布

北京依然是拥有最多 600 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增加 1.1 万户，达到 71.5 万户，增幅 1.6%，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26.8 万户；广东第二，600 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 1.3 万户，达到 69.2 万户，增幅 1.9%，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25.6 万户；上海第三，600 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 9,000 户，达到 61.1 万户，增幅 1.5%，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21.4 万户；香港第四，600 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减少 2,000 户，达到 54.9 万户，降幅 0.4%，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19.3 万户；浙江第五，600 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比上年增加 9,000 户，达到 52.5 万户，增幅 1.7%，其中拥有 600 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有 18.5 万户。

600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城市分布Top 10

	城市	600万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数量（比上年增加）
		单位：户
1	北京	715,000 (+11,000)
2	上海	611,000 (+9,000)
3	香港	549,000 (-2,000)
4	深圳	174,000 (+4,000)
5	广州	166,000 (+4,000)
6	杭州	127,000 (+2,900)
7	宁波	98,600 (+2,700)
8	佛山	74,700 (+1,700)
9	台北	70,300 (+700)
10	天津	64,600 (+500)
	其他	2,359,800
	总数	5,010,000

2. 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分布

北京仍然是拥有最多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的地区，比上年增加 6,000 户，达到 29.4 万户，增长 2%，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4.9 万户；广东第二，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年

增加 6,000 户，达到 29.1 万户，增长 2.1%，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6.5 万户；上海第三，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增加 6,000 户，达到 25.5 万户，增长 2.4%，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4.6 万户；香港第四，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增加 1,000 户，达到 22.3 万户，增长 0.5%，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1.4 万户；浙江第五，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比上增加 6,000 户，达到 19.9 万户，增长 3%，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 10.1 万户。

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城市分布 Top 10

	城市	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数量（比上增加）
		单位：户
1	北京	294,000 (+6,000)
2	上海	255,000 (+6,000)
3	香港	223,000 (+1,000)
4	深圳	75,700 (+2,000)
5	广州	68,900 (+1,300)
6	杭州	48,200 (+1,600)
7	宁波	36,000 (+1,200)
8	台北	33,000 (+600)
9	佛山	31,300 (+700)
10	天津	26,400 (+300)
	其他	928,500
	总数	2,020,000

（未完）

作者：胡润百富

来源及全文链接：胡润百富网

<https://www.hurun.net/zh-CN/Info/Detail?num=FEY5J1G3EQ7P>

2020 年资产证券化发展报告

编者语：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行先抑后扬，全年发行标准化产品[1]2.87 万亿元，年末存量规模超过 5 万亿元，整体延续增长态势。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行信息登记制度。产品创新持续推进，多单疫情防控 ABS 发行，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启动，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推出。资产证券化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建议推动穿透式标准化信息披露，加大资产证券化与不良处置和小微企业融资的对接力度，坚持合规发展，加强风险防控，促进市场联通，推动资产证券化市场实现更加安全、更加透明、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敬请阅读。

一、监管动态

1. 多举措便利疫情期间业务开展

2020年初，金融监管部门发布一系列政策，便利了疫情期间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发行和存续期管理。

2020年2月7日，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采取多项便利措施支持资产支持证券等债券品种发行。具体包括远程办理发行工作，暂缓计算已核准或注册额度有效期，鼓励远程招标发行，存续期内合理调整信息披露时限要求，建立“绿色通道”支持募集资金用于疫情防控债券以及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债券发行等。

证监会债券监管部以及沪深交易所于2月上旬对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发行和存续期管理作出调整。具体包括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暂缓计算发行与审核业务相关时限和无异议函有效期，现场和非现场结合进行簿记建档和申购，存续期内可申请延期信息披露，建立疫情防控相关项目“绿色通道”等。

2. 信贷资产证券化实施信息登记制度

2020年9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不再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实施备案登记，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通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应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简称“银登中心”）进行信息集中统一登记，按产品逐笔提交数据和资料等，并取得唯一性的产品信息登记编码。受托机构持有产品信息登记编码，按程序申请发行。10月15日，银登中心发布《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业务规则（试行）》，对信息登记流程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实施细则。11月13日，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登记正式启动实施。

信息登记制将进一步提升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运作效率，优化登记管理流程，并实现对基础资产的穿透登记，提升底层数据的标准化水平，有助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市场规范度和透明度，为市场长远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3. 保险资管产品投资 ABS 范围扩大

2020年3月25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在银行间市场或者证券交易所市场等交易市场发行的证券化产品属于保险资管产品的投资范围”。

按照原保监会发布的《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保险资管产品所能投资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仅限于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暂行办法将保险资管产品的投资范围扩大到了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支持票据，有利于提升保险资管产品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的活跃度，对促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4. 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推出

2020年6月2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在现行资产支持票据（ABN）规则体系下研究推出资产支持类融资直达创新产品——资产支持商业

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ABCP），并推动首批 5 单试点项目落地。

ABCP 是指单一或多个企业（发起机构）把自身拥有的、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应收账款、票据等资产按照“破产隔离、真实出售”的原则出售给特定目的载体（SPV），并由 SPV 以资产为支持进行滚动发行的短期证券化类货币市场工具，为企业提供了兼具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的新型工具。作为传统 ABN 产品的短期限、滚动发行版本，ABCP 的推出有助于丰富资产证券化产品类型，提升企业盘活存量资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5. 公募 REITs、知识产权 ABS 获推动

2020 年 4 月 24 日，证监会与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的基本原则、试点项目要求和试点工作安排，标志着境内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试点正式起步。8 月 6 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明确了公募基础设施 REITs 的产品定义、运作模式、基金份额发售方式等，并要求压实机构主体责任，严控基础设施项目质量，规范基金投资运作，加强风险防控。

4 月 30 日，财政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做好 2020 年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依法依规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要求积极复制借鉴现有成熟经验，以产业链条或产业集群高价值专利组合为基础，支持构建底层知识产权资产，完善知识产权证券化配套扶持政策，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政策支持下，预计知识产权证券化将迎来发展空间。

二、市场运行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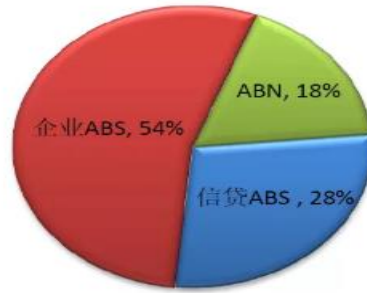
1. 发行规模继续增长

2020 年，我国共发行标准化资产证券化产品 28749.27 亿元，同比增长 23%；年末市场存量为 51862.60 亿元，同比增长 24%。

三类标准化产品的发行情况有所分化。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银行信贷资产生成速度下降，存量资产出表需求不足，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以下简称“信贷 ABS”）发行明显放缓，下半年发行提速，全年发行量小幅回落；而在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及低利率环境下，以非金融企业为发起主体的企业资产支持证券（以下简称“企业 ABS”）和 ABN 的发行规模快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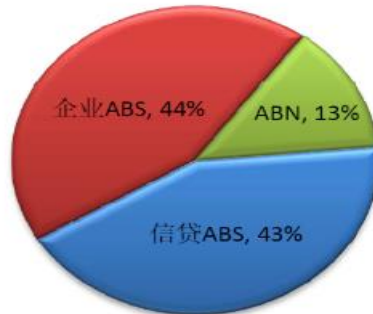
具体来看，2020 年信贷 ABS 发行 8041.90 亿元，同比下降 16%，占发行总量的 28%；年末存量为 22220.93 亿元，同比增长 10%，占市场总量的 43%。企业 ABS 发行 15598.99 亿元，同比增长 43%，占发行总量的 54%；年末存量为 22630.04 亿元，同比增长 27%，占市场总量的 44%。ABN 发行 5108.38 亿元，同比增长 77%，占发行总量的 18%；年末存量为 7011.63 亿元，同比增长 74%，占市场总量的 13%。

2020年资产证券化市场发行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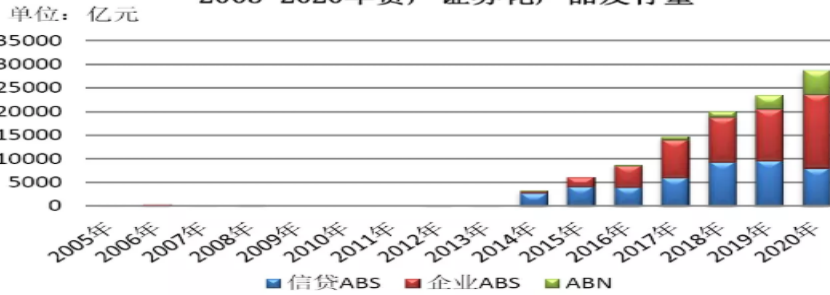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央结算公司，Wind 资讯

2020年末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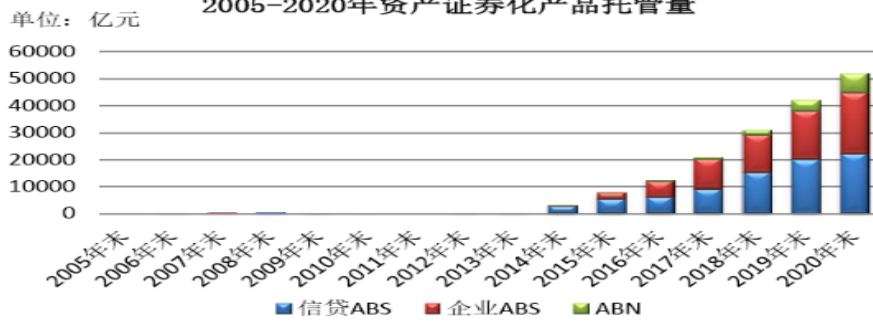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央结算公司，Wind 资讯

2005-2020年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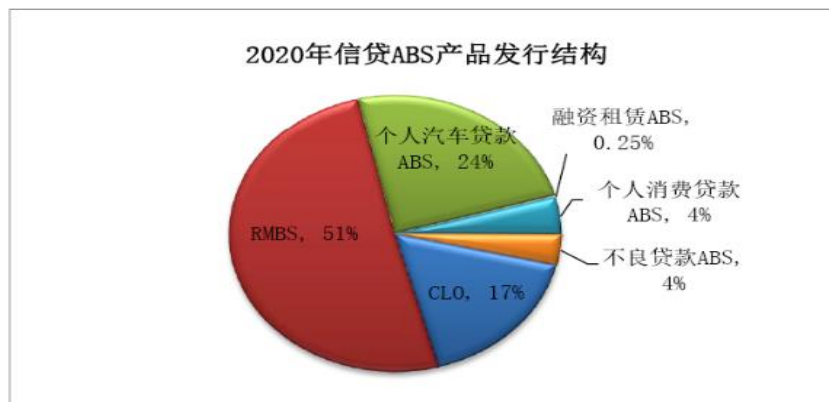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央结算公司，Wind 资讯

2005-2020年资产证券化产品托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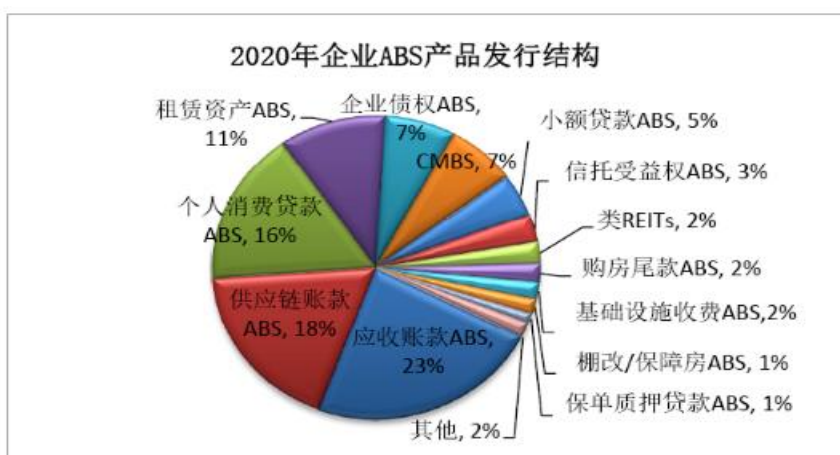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央结算公司，Wind 资讯

信贷 ABS 中，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仍是发行规模最大的品种，全年发行 4072.63 亿元，同比下降 21%，占信贷 ABS 发行量的 51%；个人汽车贷款 ABS 发行 1940.32 亿元，同比下降 1.3%，占信贷 ABS 发行量的 24%；公司信贷类资产支持证券（CLO）发行 1379 亿元，同比增长 55%，占 17%；个人消费性贷款 ABS 发行 347.41 亿元，同比增长 33%，占 4%；不良贷款 ABS 发行 282.6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97%，占近 4%；融资租赁 ABS 发行 19.93 亿元，同比下降 49%，占 0.25%。



数据来源：中央结算公司，Wind 资讯

企业 ABS 中，应收账款 ABS、供应链账款 ABS、个人消费贷款 ABS 和租赁资产 ABS 分别发行 3616.92 亿元、2841.07 亿元、2563.72 亿元和 1660.48 亿元，占企业 ABS 发行量的 23%、18%、16%和 11%；企业债权 ABS 和 CMBS（商业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行量超过 1000 亿元，占比接近 7%；小额贷款 ABS 和信托受益权 ABS 发行占比分别接近 5%和 3%；类 REITs、购房尾款 ABS、基础设施收费 ABS、棚改/保障房 ABS 和保单质押贷款 ABS 发行量占 1%以上；其他产品[2]发行量合计占比接近 2%。



数据来源：中央结算公司，Wind 资讯

2. 发行利率先抑后扬

2020 年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利率上半年震荡下行，下半年有所回升。

其中,信贷 ABS 优先 A 档证券最高发行利率为 5%,最低发行利率为 1.65%,平均发行利率为 3.45%,全年累计上行 35 个 bp; 优先 B 档证券最高发行利率为 5.78%,最低发行利率为 2.40%,平均发行利率为 3.92%,全年累计下行 39 个 bp。

企业 ABS 优先 A 档证券最高发行利率为 8.30%,最低发行利率为 1.80%,平均发行利率为 4.10%,全年累计上行 14 个 bp; 优先 B 档证券最高发行利率为 12%,最低发行利率为 2.6%,平均发行利率为 5.58%,全年累计上行 90 个 bp。

ABN 优先 A 档证券最高发行利率为 7.50%,最低发行利率为 2%,平均发行利率为 4.03%,全年累计上行 5 个 bp; 优先 B 档证券最高发行利率为 7.80%,最低发行利率为 2.60%,平均发行利率为 4.70%,全年累计上行 96 个 bp。

(未完)

作者: 中债研发中心

来源及全文链接: 金融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H7ph0JXnjM0pBI6CHtxlW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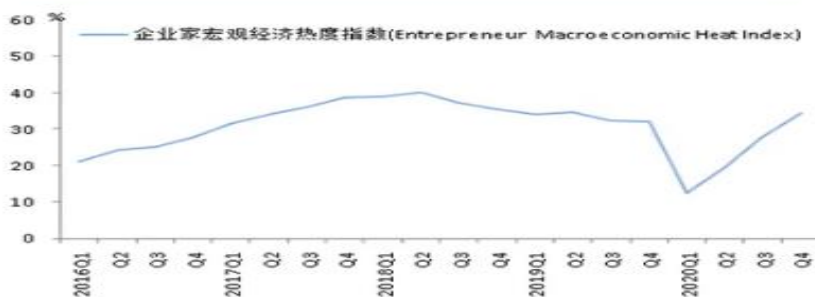
人民银行发布《2020 年第四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



一、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

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34.4%，比上季提高 6.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2.6 个百分点。其中，33.3%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偏冷”，64.6%认为“正常”，2.1%认为“偏热”。

图1：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二、产品销售价格感受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感受指数

产品销售价格感受指数为 53.3%，比上季提高 5.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5.6 个百分点。其中，17.4%的企业家认为本季产品销售价格比上季“上升”，71.7%认为“持平”，10.9%认为“下降”。

原材料购进价格感受指数为 64.2%，比上季提高 5.5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7.0 个百分点。其中，31.4%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原材料购进价格比上季“上升”，65.6%认为“持平”，3.0%认为“下降”。

图2：产品销售价格感受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感受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三、出口订单指数和国内订单指数

出口订单指数为 46.4%，比上季提高 2.8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3.1 个百分点。其中，20.3%的企业家认为出口订单比上季“增加”，52.2%认为“持平”，27.5%认为“减少”。

国内订单指数为 55.0%，比上季提高 2.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其中，26.8%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国内订单比上季“增加”，56.5%认为“持平”，16.7%认为“减少”。

图3：出口订单指数和国内订单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四、资金周转指数和销货款回笼指数

资金周转指数为 59.3%，比上季提高 3.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其中，32.8%的企业家认为本季资金周转状况“良好”，53.0%认为“一般”，14.2%认为“困难”。

销货款回笼指数为 62.7%，比上季提高 4.5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 1.0 个百分点。其中，34.2%的企业家认为本季销货款回笼状况“良好”，57.0%认为“一般”，8.8%认为“困难”。

图 4：资金周转指数和销货款回笼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五、经营景气指数和盈利指数

经营景气指数为 55.8%，比上季提高 6.4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24.8%的企业家认为本季企业经营状况“较好”，62.0%认为“一般”，13.2%认为“较差”。

盈利指数为 59.8%，比上季提高 2.9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其中，41.7%的企业家认为比上季“增盈或减亏”，36.2%认为“盈亏不变”，22.1%认为“增亏或减盈”。

图 5：经营景气指数和盈利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qfvIkp0z1v3MCitvKrLmeQ>

★区块链论坛

陈纯院士分享区块链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进展

lockcha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是爱思唯尔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全新开放获取期刊，定位成为面向全球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布一流的区块链技术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本次，期刊主编陈纯院士为各位读者介绍这本新刊并分享区块链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进展。



陈纯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信息学部主任，国家数码喷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1990年获浙江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学位。曾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和浙江大学计算机软件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6项。近年来率领科研团队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和系统进行了重点研发，有关成果在相关应用领域得到了全面推广。2018年创立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主任，2019年10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作讲解。

一、关于期刊 **Blockcha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爱思唯尔：这本新期刊的定位和发展使命是什么？您对于本刊的未来发展预期是什么？

陈纯院士：区块链被称为改变人类社会价值传递方式的新革命，区块链的应用正从金融科技逐步延伸到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各个领域，成为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当前，区块链技术得到了广泛关注，全球各主要国家和组织都在加快区块链的研究和布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区块链期刊的创办对推动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突破等有着重要意义。这本新期刊定位成为面向全球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布一流的区块链技术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预期是3至5年成为国际区块链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期刊，5至10年成为区块链及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交流成果发布和交流平台，推动区块链学科的交叉融合，引领未来信用社会和价值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爱思唯尔：对于这本新的开放获取期刊，您计划采取何种方式和策略，在海内外扩大它的影响力呢？

陈纯院士：扩大海内外影响力是成为领军期刊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扩大影响力。一是发挥学科优势和地域优势，依托浙江大学计算机学科以及中国区块链发展优势，汇聚区块链研究领域的资源，让期刊成为前沿研究阵地；二是与国内外重要会议建立联系，组建领域专业学术社群，为本领域学者学术交流提供专业化的平台服务；三是进一步吸引国际优秀学者参与编委队伍和审稿专家队伍；四是拓展国际化的宣传渠道，借助 Elsevier 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国内外的平台推广，利用 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以及全球精准文章推送服务等全方位提升传播影响力。

爱思唯尔：您觉得 Blockcha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有哪些优势，您推荐作者向这本期刊投稿的理由是什么？

陈纯院士：BCRA 是一本开放获取的国际期刊，特色鲜明聚焦区块链新兴领域。期刊严格执行国内国际规范，坚持国际化审稿，作者的每篇文章都会组织国际上该领域的知名专家对稿件进行细致、认真的审查，择优录用。作者的文章一般将在 40 天内获得初审意见。发表的文章将可以通过学术社交媒体实现精准推送，协助作者推广学术成果。

爱思唯尔：期刊收稿范围与方向？您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稿件？

陈纯院士：期刊收稿范围主要与区块链技术相关的各个相关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学术领域包括区块链体系架构、区块链安全、隐私计算、分布式网络通信、共识机制、数据库、信任体系的重构等；区块链技术在各个相关行业应用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解决方案、生态系统及监管环境等。我们期待该领域内的创新性研究、高质量论文、热点讨论等。

重点栏目包括（1）区块链理论与战略，具体包括区块链数据管理、分布式共识算法、智能合约形式化验证、密码学、博弈论等；（2）联盟区块链研究，具体为隐私保护、安全多方计算、高性能共识算法、高性能智能合约执行引擎；（3）公有链研究，包括跨链协议、状态通道、分片技术、超大规模区块链网络模型、分层区块链体系结构；（4）区块链应用与产业化，包括区块链应用安全体系、面向金融和共享经济平台的区块链应用。

爱思唯尔：如何向这本期刊投稿？稿件从投稿到发表需要多长时间？

陈纯院士：目前可以通过 EM 投审稿系统进行投稿，稿件从投稿到发表周期一般为 90 天。<https://www.editorialmanager.com/bcra/>

二、关于开放获取

爱思唯尔：您如何看待开放获取？目前，区块链的中国学者对开放获取的普遍想法是如何？您会如何鼓励更多学者选择开放获取呢？

陈纯院士：开放获取，减少了读者获取的时间和成本，可以最快让学术成果得到广泛共享。本刊实施的严格同行评审，同时保证了学术质量，将为区块链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术交流空间，可以快速促进该领域的发展。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对开放获取持欢迎态度。我们将通过对本刊的宣传，引导鼓

励更多的学者选择开放获取。

三、关于区块链领域

爱思唯尔：您觉得区块链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目前做的如何？

陈纯院士：区块链领域的国际学术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很多来自不同计算机领域例如信息安全、软件工程、大数据等的科研人员相互合作，一起推动了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专门面向区块链的学术会议和期刊，为区块链领域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交流和合作的平台。本期刊的编委团队就包括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区块链领域的专家学者。浙江大学在区块链领域的研究也是和很多国外的专家学者紧密合作的，例如浙江大学已经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学者合作开展了在智能合约开发和维护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

爱思唯尔：针对区块链领域的学术发展情况，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海外相比，是处在什么位置？

陈纯院士：我国的区块链技术发展和世界各国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但是海外区块链的研究发展热点主要集中于公有链技术和应用以及基于公有链的金融创新应用，而我国区块链的研究热点集中于联盟链的关键技术及应用，以及区块链监管技术、标准制定以及区块链全方位安全架构等领域，最终实现区块链技术的可用、可管、可控，服务实体经济，发挥其最大价值。国内也已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国产联盟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支撑了在政务、金融、供应链、医疗、能源、商品溯源、公益等领域的多个代表性应用。

爱思唯尔：在区块链领域，您是如何看待产学研结合？目前，区块链领域的中国研究人员是如何看待在实际产业中的应用的？

陈纯院士：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产学研相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区块链技术融合多种关键技术如分布式存储、点对点网络、共识机制、密码学和智能合约都是学术界的成果，同时区块链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众多国际科技巨头公司及产业和行业联盟的推动。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实践是“双轮”驱动、双向互动的。同时区块链的产学研在一些方面也是亟待加强，主要表现在现有的学术界研究工作主要是基于一些公链展开的，例如比特币、以太坊等；然而产业界落地的区块链应用还是以联盟链为主。

区块链技术可以使数据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不可伪造、可追溯，能够构建一个全新的价值传递网络，促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的发展，是建设下一代互联网可信基础设施的关键支撑技术。我国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十分丰富，在司法存证、政务数据共享、供应链金融、商品溯源、版权保护等领域已有成功落地应用，应用需求潜在巨大。

四、对于中国研究人员的建议

爱思唯尔：对于想要向 **Blockcha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投稿的中国学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陈纯院士：本期刊非常欢迎中国学者投稿关于区块链的各类研究工作，区块链技术目前正处在技术创新发展的初期，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区块链技术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亟需突破。首先，我国区块链基础理论贡献仍然匮乏，如新型区块链体系结构、区块链网络、新型共识等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我国区块链生态碎片化严重，尚未形成如以太坊、超级账本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技术生态，而且整个区块链发展尚未形成统一技术标准，各个联盟链、私有链难以互联互通；最后，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型的监管难题，需要研究者聚焦由于分布式架构、难篡改、匿名性等区块链技术特性带来的监管难题，着力解决区块链系统及业务实现存在的设计风险和外延性风险。因此，希望中国学者能够针对上述我国区块链面临的挑战，刻苦专研，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爱思唯尔：对于提高中国在区块链的研究水平和行业发展，您有何宝贵建议？

陈纯院士：我国的区块链研究和行业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也有很大的机遇，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我国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十分丰富，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其二，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总体与国际同步，均面对大量的技术“无人区”，有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因此，我国应当依托丰富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大力提升区块链的研究水平和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需要建立统一的区块链技术标准，推动良好的区块链生态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双轮”驱动、双向互动，大力推动建立自主可控、高效安全、广泛适用的区块链底层技术体系和行业应用生态系统。

来源：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Iq4nwZJ7iZNTibFRG5uStQ>

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的“茶纹链”溯源应用

易见纹语科技有限公司是易见股份旗下高科技公司，专注于把领先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创新技术应用到数字农业，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农业数字化平台。实现农产品本体溯源、生产加工过程视频自动化分析、智能仓储、可信交易、金融服务等。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农业快速发展。目前科技总部位于北京，包括了来自 IBM 中国、华为、京东等的技术骨干团队，以及来自北大、西交、北航、人大等众多著名高校的博士硕士研发队伍；业务总部位于昆明，业务范围已覆盖了茶叶、红酒、橡胶、工业大麻、中药材、餐饮等多项农业产业。

一、引言

早在两年前普洱茶行业就出现过单纯依靠数字“ID”的方法进行溯源的技术，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对应的终端进行扫码，可以做到“一茶一码”。但这类方法存在着最大的弊端：茶饼包装上的二维码或芯片可以被掉包或篡改，无法把真正的物理“茶饼”保护起来。而且，在整个产业链的其它环节仍然无法做到溯

源。如，普洱茶古茶树的养护、采收环节，普洱茶初制加工厂和精制加工厂的生产环节，普洱茶的仓储管理环节，都缺乏监管，还处于比较粗放的生产状态。

普洱茶业界需要新一代的可信溯源技术：确保可信溯源到普洱茶茶饼本体，帮助消费者买到真实可信的普洱茶饼；提高普洱茶相关生产企业的生产合规性，提升产品质量；有利于古茶树等珍惜资源的溯源和保护等。同时，通过新一代可信溯源的技术应用进一步提升普洱茶乃至整个农产品产业的数字化水平。

二、方案概述

本案例主要面向农业产业中普洱茶全链条可信溯源及整个普洱茶产业的数字化升级问题，为普洱茶的种植、采收、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都带来了巨大改变。

茶饼茶纹的上链和智能识别技术，帮助消费者确保买到真实可信的产品，提高了市场的有序性，也提高了相关茶厂的品牌价值；古茶树的上链，既有利于产品溯源，又有利于古茶树资源的保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数字茶园方便的查到古茶树的分布和气候、土壤等环境信息；茶企生产过程的上链，可以帮助经销商和消费者了解茶企的生产过程和管理水平，也可以帮助茶企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的异常操作，提高产品质量。

区块链技术加上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了整个普洱茶产业的升级。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可信农业，为普洱茶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易见纹语科技除了继续在茶叶领域深耕，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的新一代溯源技术也已拓展到中药材、红酒、肉类、燕窝等新领域，形成一套通用的针对农产品纹理特征的覆盖整个农产品全链条的溯源科技。

三、行业痛点和解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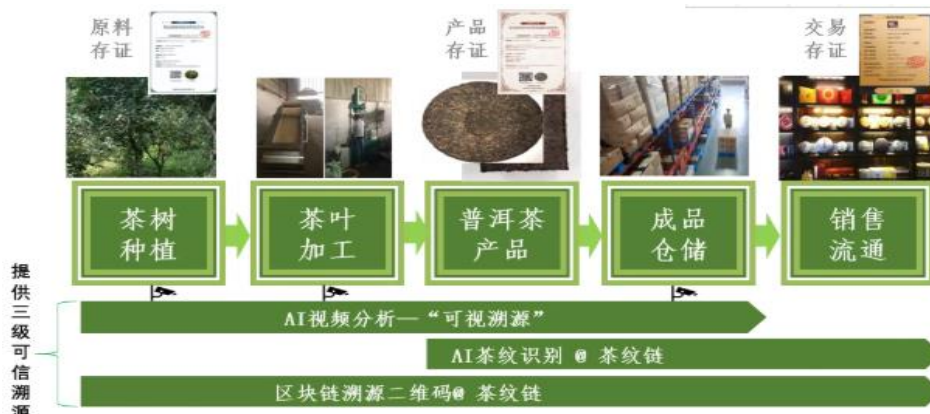
行业痛点：

当前的普洱茶溯源技术发展存在以下问题：

- (1) 不能溯源到产品本体；
- (2) 传统溯源系统各个环节采集数据可信度和公信力不高；
- (3) 传统溯源系统不能解决产品质量等纠纷问题。

解决思路：

2019年12月云南易见纹语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研发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的普洱茶“茶纹链”三级溯源防伪及全链路多节点存证系统：



“茶纹链”三级溯源防伪：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二维码溯源（一茶一码）

基于机器学习和图像分析的茶纹识别（一茶一纹一码）及上链

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短片自动剪辑上链记录每饼茶的生产过程

“茶纹链”多节点存证：

包括在茶叶原材料（如古茶树）和普洱茶成品茶饼的溯源存证，以及在普洱茶成品茶饼在销售流通环节的交易存证。所有证书基于区块链技术，上链存证。

其中三级溯源防伪具体解释如下：

（1）茶纹链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二维码数字证书的不可篡改性，实现“一茶一码”@茶纹链，包括：一茶树—码，一茶饼—码等。

（2）茶纹链利用高精度的普洱茶纹理识别+区块链技术，并绑定到二维码，实现“一茶饼—纹—码”@茶纹链，确保可以溯源到茶饼本体：一个茶饼由超过1万片茶叶压制而成，利用茶饼与“生”俱来难以篡改的茶纹特性，通过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自动学习茶饼纹理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为每一个茶饼生成一个高维茶纹矢量，并上链存证于区块链中。茶企于茶饼出厂时录入茶纹，消费者可做茶纹验真，确保所购买茶饼和出厂茶饼为一致茶饼。

（3）茶纹链利用覆盖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到茶饼仓储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可视溯源”+区块链技术，并绑定到二维码，实现“一茶饼—视频—码”@茶纹链，确保生产过程的透明化：通过人工智能视频捕获与编辑技术，自动将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剪辑生成可视化小视频，并上链存证于区块链中，作为追踪溯源和质量保证的证据，保证了普洱茶整个生产周期的安全性。

四、创新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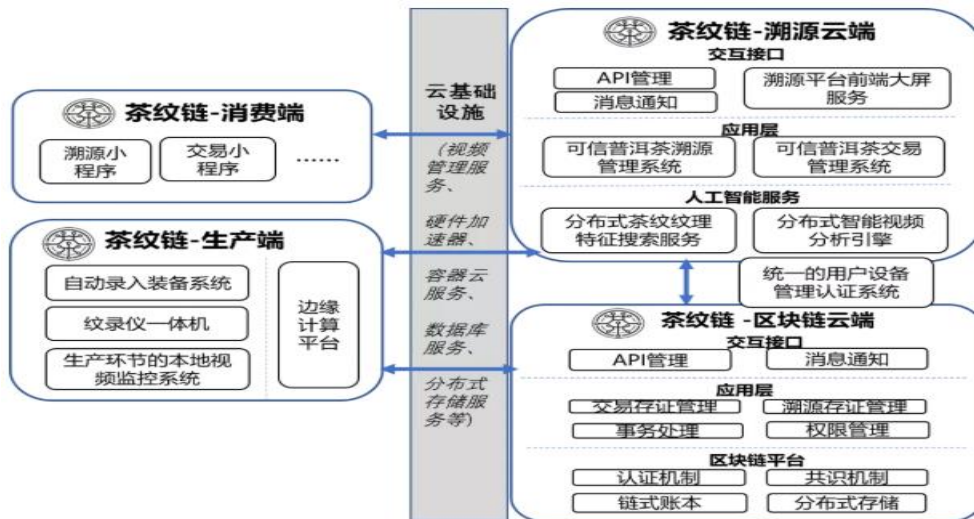
茶纹链由前端（生产和消费前端）系统和云端（溯源和区块链云端）平台构成：生产端包括手动和自动茶纹录入设备及本地视频监控系统，该生产端通过边缘计算予以加速；消费端通过溯源和交易小程序可以实现消费者的溯源验真和可信交易。溯源云端实现对可信普洱茶溯源和交易管理；区块链云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溯源茶纹、视频及交易的不可篡改。

同时，基于区块链共识机制为整个普洱茶的种植、采收、生产、流通、消费和监管整个生命周期都构建了完整的普洱茶全产业链的可信溯源数据网络，可以实现：

（1）茶园、茶厂、仓储物流、经销商、监管部门等多参与方；

（2）数据特征上链、保证真实性和可溯源；

（3）企业自主控制数据共享对象和开放程度，消除隐私安全性担忧。



五、应用成果



目前，“茶纹链”已经服务了普洱茶最主要的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三大产区，入驻近 70 家茶企/经销商（包括安宁海湾茶业、云南龙生茶业、云南农垦集团八角亭茶厂、昆明茶厂等），溯源上链普洱茶产品 630+批次，溯源录入普洱茶 150+万饼，是全国进驻茶企及溯源产品批次最多的茶叶溯源平台。同时，易见纹语科技通过与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合作，试点了古树茶园的数字化溯源。目前正在勐库、永德等重要茶区溯源了上千棵古树，为古树茶园的资源保护和数字化管理奠定了工作基础。“茶纹链”入选国家网信办发布的 2020 年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清单（第四批）-滇网信（备 53011120765669640011 号）。

同时易见纹语科技进一步扩展“茶纹链”为更具体广泛意义的“物纹链”，已经覆盖了更多高价值的农产品，包括红酒、中药材、肉类等。

通过本案例的研究，将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对具有天然（或人工）纹理产品的追踪追溯和防伪验真工作，建立农产品全生命周期视频监管链路，结合工业互联网架构，打造农产品溯源全链条服务平台，为溯源应用示范提供基础平台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农产品溯源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培育区块链等信息产业，推动可信农业数字化进步和区块链产业的发展。

来源：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QQRcKpN8OqoEbUNUABcadg>

浙江大学蔡亮：区块链底层技术创新是关键

近日，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共同主办的“2020 可信区块链峰会”在京隆重举行。作为我国区块链领域的知名盛会，本次活动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业界领袖等人士齐聚一堂，对区块链相关政策和热点话题展开了交流讨论。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蔡亮应邀出席大会主论坛，并以《联盟区块链核心技术与监管》为题带来了精彩分享。

2020 可信区块链峰会开幕式由中国信通院副院长余晓晖主持。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奚国华，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何桂立，中国信通院副总工程师史德年，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所长、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常务副理事长何宝宏，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所长、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秘书长魏凯等领导、专家出席本次活动。活动期间，《区块链白皮书(2020年)》、“可信链网”、2020年可信区块链测评结果正式发布。

活动期间，蔡亮教授接受了「中国证券报」的专访。他表示，当下区块链产业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展深化，行业应用价值开始凸显，随着区块链初步满足应用需求，芯片模组、网络架构、存储引擎等区块链底层技术创新也提上日程。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要加大力度、扎扎实实地做好区块链关键技术研究，建设国产自主可控的联盟链。

一、面临安全挑战

蔡亮教授在采访中表示，区块链列入“新基建”范畴，国家多个部委和地方出台区块链促进政策，区块链应用和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中国信通院副总工程师史德年近日表示，多地加速部署区块链相关应用，基本上所有省份都启动了区块链相关布局，2020年上半年一线城市发布相关政策数量明显增多。

我国区块链的监管框架基本成形。蔡亮介绍，我国对区块链的监管要求包括实名制、备案制，并设置监管节点。截至2020年12月，中央网信办累计公布了四批1015个备案编号，且区块链应用链监管系统已经开展首批试点接入工作。

史德年表示，随着区块链应用发展，风险与挑战逐渐增大。“安全是区块链未来的生命力保障，如何围绕物理、数据、应用系统等构建安全体系，是区块链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中，合约安全和隐私保护是两大焦点。”

蔡亮强调，“区块链是承载高价值数字资产的底层基础设施，其面临的安全挑战会比传统互联网系统更加严峻。一旦存在缺陷，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除了网络安全，蔡亮介绍，区块链还面临金融安全等挑战，“我国应该构建一个涵盖内容监管、行业监管和金融监管等的区块链协同监管体制。这是区块链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创新底层技术

蔡亮表示，目前公有链难以满足监管要求，联盟链是我国区块链产业的主旋

律。谈及区块链技术发展趋势，蔡亮认为，核心技术将从基于传统计算平台构建区块链，转变成为区块链匹配合适的底层支撑技术。

“以前基于互联网时代现成的计算平台、网络协议、数据库管理系统等构建区块链，但在区块链平台基本能够满足当前应用需求之后，就需要思考区块链最需要的计算结构到底是什么，最匹配的网络协议是什么，最合适的存储引擎又是什么。这个理念的转变将极大推进区块链底层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蔡亮说。

事实上，底层支撑技术已经影响区块链应用的性能和效率。以数据库为例，传统的数据库是一个很“重”的系统，其解决的是通用数据查询与处理，而区块链的数据存储是非常规整的，且每一笔交易都排好了次序，有明确的时间戳，如果按照区块链数据存储特点研发专用的区块链存储引擎，可以大大提高区块链的数据吞吐能力。

此外，蔡亮表示，区块链应用还需解决数据真实性的“第一公里”问题。“区块链溯源应用如何确保数据源的真实性是关键，需要结合 IOT 技术，研发区块链专用模组、区块链专用芯片，在数据产生端实时上链，实现数据可信采集，达成数据真实性闭环。实际上，一年前业界已经有了类似尝试”。蔡亮表示，我国区块链发展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要加大力度、扎扎实实做好区块链关键技术研究，建设国产自主可控的联盟链。

史德年也指出，我国区块链项目以行业建链为主，存在重复建设、互通难的问题。区块链技术自主创新仍有待突破，解决性能、安全性、分布式三方因素的平衡难题。

三、发挥应用价值

针对区块链底层技术，蔡亮研究团队一年前推出了区块链专用模组，并实现了在部分电器设备上的应用。“如此一来，这台机器运作的原始数据直接上链，什么时候开机、服务了多少次等数据可以实现多方共同见证。”

蔡亮举例说：“学校的一台商用共享洗衣机三年使用 1 万次，洗涤价格大概是快速洗程序 2 元 30 分钟，4 元标准洗 45 分钟，6 元强力洗 60 分钟，每种洗涤方式的耗电、耗水成本完全不一样，收益分成方式可能也不一样。洗衣店家、学校后勤以及其他投资方必须得到真实可信的数据才能确保有效分成。如果仅是店家或学校一方提供数据，可能并不会让其他人信服，如果把区块链模块嵌入机器，开了多少次机、洗了多少次等数据就一目了然、不可篡改，有利于各投资合作方共享收益。”

类似的应用案例还有很多，包括充电桩等涉及多方利益协作的案例。蔡亮强调，“区块链技术适用于需要多方参与、共同维护以增强信任的应用场景。区块链价值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与颠覆，要看到分布式信任机制带来的组织管理模式等创新。”

来源：浙江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0_0H_II_zSIEOgVujmtsXQ

★公益慈善论坛

关于慈善研究，青年慈善学人在关注什么？

编者按

第四届敦和·竹林论坛暨中国社会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第二届公益社会学分论坛，以“公益慈善与治理转型”为主题，设置了“公益组织与合作治理”“志愿服务与参与治理”“捐赠行为与居民自治”“社区公益与基层治理”“慈善文化与全球治理”“公益法律与慈善经济”六场专题研讨，邀请了近 30 位青年学者参与交流和讨论。

今年，参与论坛的青年学者的学科背景相较以往，更为丰富。除了社会学外，还有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参与。

本届论坛设置的“优秀论文”评选环节，由每个专题研讨的主持人和评论人从当组论文中评选出一篇优秀论文。最终，叶士华与孙涛、胡明、杨永娇、赖伟军、景燕春和尹晖七位学者的六篇论文获评本届论坛的“优秀论文”奖。值得一提的是，武洵宇和朱健刚两位学者的论文获得了中国社会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奖。

本文系统摘编了 7 篇由青年慈善学者独立或参与完成论文的核心内容。

一、中西共同建构，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转型

《中西共同建构的华人慈善的近代转型——以 Dean Lung 捐设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席为例》

武洵宇 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

朱健刚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1901 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旅美华人仆役 Dean Lung 将 1.2 万美金捐赠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Dean Lung 汉学讲座”。这一创举不仅缔造了北美汉学研究最古老的先驱之一，而且成为百年以来生产和输出汉学知识与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捐赠发生的那一年，美国《排华法案》正在施行，中国国内则刚刚经历庚子之乱，《辛丑条约》签订在即。人们无从得知一名身份低微的华仆如何能在国力羸弱、海外华人遍受排挤的艰难年岁，努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向外传播。

学界有关同时期海外华人华侨慈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出发地故土宗族所进行的捐赠；二是对移居地同乡同族社区所做的慈善。周秋光曾对此分析道：“中国慈善是一种自内而外的散发式慈善，救助及惠益之人，首先是施善者宗亲乡里，尔后是与施善者相识或有往来之人……若以海外华侨慈善事业观之，此特征尤为明显。如华侨在国内的慈善行为，多集中在桑梓故土，移居地慈善行为多针对同乡华人聚集区域。”

“自内而外的散发式”无疑是对差序格局原理的另一表述，却难以解释诸如

Dean Lung 捐赠这般力图为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善举何以发生。藉此，本文以“Dean Lung”事件为例，通过深描这一海外捐赠的发生过程并分析其中的文化动力，从中说明：中国公益慈善近代转型与西方相类领域的互动逻辑并非简单地“受西方影响”，而是形成了一个由中、西方慈善家共同构成的跨境慈善网络。在此之中，华人慈善家与具有积极中国观的西方慈善家进行合作，在共同践行现代普世性公益慈善观念的过程中，将之同时转化为某种可能具有群学色彩的、促进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转型的“公益”实践。

二、新一代年轻人的捐赠行为更容易受到从众因素影响

《中国个人捐赠行为的集体主义取向：基于 CLDS 的实证研究》

杨永娇 重庆大学副教授

新中国建国以来，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身处其中的人们，因年龄、环境等因素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他们在慈善意识、慈善行为、慈善体会上都呈现不同的特点。

研究发现，调查对象捐赠行为总体而言更容易受到集体主义动机而非个人主义动机的影响，而且从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不仅削弱了利己主义的影响，还削弱了利他主义的影响。

其次，尽管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剧烈转型，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仍然是集体主义，即本土文化在慈善事业发挥巨大力量。

最后，个人捐赠动机确实存在一些代际差异，只有老一辈的人在捐赠时受到利他的影响较大，新一代人更容易受到从众因素的影响。

这给公益慈善行业带来三点启示：第一，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要充分利用社交网络，让活动通过朋友圈与所有有关系的人连接起来，利用从众效应吸引大家参与。第二，许多人尤其是明星，将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慈善作为一种工具来利用，这种行为值得认真探讨。第三，在现代化力量和传统文化的博弈中，对于中国而言，厚重的文化基础对个人慈善动机的影响依旧更强。

三、组织收入规模越大，越可能获得扩张与发展

《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组织资本视角》

叶士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孙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在宏观政策与治理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社会的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已发生显著改变。基于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1）组织收入规模越大，组织议价能力越强，越有可能获得扩张与发展、跨区域提供服务，及按照合同提供而非被额外安排其他服务的组织自主性；（2）政治资本仅对发展与扩张自主性有显著影响。

长期以来，有研究者倾向于将“脱嵌”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想路径。该论文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静态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改变，但在社会治理转型

过程中，社会组织仍可利用自身社会影响力，获取自主空间。这也表明，社会组织未来的出路并不一定是通过资金多样化、公益化以实现“脱嵌”，而是在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与政府部门共生。

此外，经济资本的增长可以提高组织根据契约提供服务的自主空间，可能原因在于，随着组织规模增大，相应能更好地展现服务专业性和规范化，或表现为对地方治理创新的强贡献能力，因此政府会减少对服务过程的干预，更愿意遵守合同规定。

另一方面，政治资本仅对发展与扩张自主性有显著影响，这或许与注册本身的制度性限制较强有关，而且是社会组织发挥自主性的第一道门槛，因此更需要政治资本发挥作用。当社会组织拥有政治资本时，更容易获取政府信任，社会组织更容易拓展组织版图。

四、自上而下动员和社会广泛参与，推动志愿服务快速发展

《跨部门比较中的中国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以北京助老志愿组织为例》

胡明 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

过去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迅猛发展，多样化的志愿服务组织，包括公共机构的志愿组织、社区志愿组织、民间志愿组织和企业志愿组织也随之涌现。然而，这些志愿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行的？来自不同部门的志愿组织在组织运行方面有何异同？尽管目前已经有少量研究表明志愿服务可能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这些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少得到确切、系统的回答。这仿佛印证了“志愿服务就是志愿服务而已”（Rochester, 1999, p. 10）因而无需深入探究的惯常态度。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2016年在北京市调研了七个来自不同部门的助老志愿服务组织，访谈了35位组织负责人和核心志愿者，实施了14次参与观察，并搜集了组织档案、项目宣传材料、媒体报道、政府文件等二手资料。

作者从治理结构、组织文化、管理过程和组织环境四个方面比较了不同部门的志愿服务组织。研究发现了志愿服务组织在组织运行方面的高度多样化。而且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特别是在组织目标和“组织-志愿者”权力关系方面。这些部门差异对志愿组织如何对待志愿者和提供志愿服务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组织在组织管理方面也有显著的共同之处，包括国家深度干预、尊重志愿者基本权利、在项目管理中遵循现实主义取向。本研究丰富了志愿组织内部管理的相关知识，并有助于我们从组织运行机制的角度理解中国志愿服务的迅速崛起及其可能的挑战。

五、情感文化治理应成为社区治理的内在核心维度

《社区自组织何以可能：历史经历、社区认同与居民自组织发育——以深圳蛇口社区基金会为例》

赖伟军 深圳大学助理教授

社区自组织的培育发展日益成为我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本论

文以深圳蛇口社区基金会为例，着重考察社区认同机制在促进居民自组织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案例研究表明，经由某种共同历史经历，塑造了居民对所在社区的强烈集体情感认同与精神文化认同，并进而成为推动社区自组织生长发育的核心内生动力。基于社区认同的自组织结构及其行动，最终也有效转化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效能。

针对案例的考察表明，八十年代“敢为天下先”的蛇口改革塑造了蛇口居民强烈社区认同，并且这种社区认同经由两种心理路径呈现出对应的二元结构。其中，基于改革亲历者有关蛇口早期改革历史的共享记忆，形成蛇口人对蛇口社区的集体情感认同；而特定时代背景下蛇口改革的先锋角色，同时赋予这段蛇口历史独特的价值意涵，相应地塑造了蛇口居民对“蛇口首创精神”的文化价值认同。

基于居民社区情感文化认同，蛇口社区基金会得以在没有太多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社区居民的自发动员和组织发展起来，并在筹备成立早期的组织缘起、机构治理、资源动员及项目开发等维度表现出高度社区能动性。

回到社区的本源属性，社区情感文化治理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内在核心维度。积极有效的社区治理需要主动挖掘潜藏于社区内部的居民集体情感与社区文化资源，以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充分调动和发挥居民社区认同对加强和改进社区治理工作的积极作用。

六、“家国依附”使传统善堂组织持续不断地获取资源，延续百年

《“家国依附”之下的当代善堂——对旅港顺德绵远堂的人类学考察》

景燕春 宁夏大学讲师

中国的善会善堂作为组织化的民间结社行为的载体，起源于明末清初，并且从中发育出了社会，但也面临慈善捐赠的徭役化、社区慈善资源的枯竭等挑战。在经历了清末民国的革故鼎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政治浪潮的洗礼，传统的善会善堂并没有如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成为历史记忆，而是继续在当代社会的脉络之中延续和发展。创始于1876年并迄今依然活跃在香港和顺德两地的旅港顺德绵远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此类善堂的鲜活案例。

旅港顺德绵远堂早期以祭奠和运棺为核心业务，兼具同乡互助和面向家乡的慈善功能，是顺德人在香港建立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历史性社团。1930年正式注册为香港可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1980年代进行改组，以关爱社群、造福桑梓为核心，慈善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和敬老三个方面，迄今仍活跃在香港和顺德两地开展其慈善活动。

本文从组织社会学资源依赖的理论视角出发，来考察绵远堂是如何动员资源以使组织绵延近一个半世纪。本文指出，绵远堂在其跨越三个世纪的运作过程中，与家乡、祖国和政治中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家国依附”的关系，使组织得以在认同符号的建构、以家乡为核心的事业版图的持续经营、资产累积与保值增资、组织机构和运营等方面得以持续不断地获取资源，使组织能够成功应对

夫马进提出的中国传统善堂的发展困境。与此同时，绵远堂由于在家乡顺德和香港两地之间建构其社会网络，由此建立起来的跨境网络，使得其组织形态更具韧性，能够在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得以保全。

此外，本文也指出这种“依附”是双向的，家国体系对组织也有一定程度的期待，主要表现在侨乡及侨务部门的工作开展对这类传统华人华侨社团倚重。

七、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三大建议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分析》

尹晖 浙江大学博士生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被各界寄予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厚望。但是公益组织面临着自身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许多公益组织为了突破困境，转型成为了“社会企业”——一种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混合组织

研究发现，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状况、扩大业务规模、增强员工满意度、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具体而言，公益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转型：一是调整战略目标，强调通过社会创新创造更大的价值；二是扩大业务范围，为弱势群体提供他们能够消费得起的产品和服务；三是转变用人策略，注重发现弱势群体的潜能，使他们能够成为共同创业的伙伴；四是优化资产配置方式，将企业获得的利润反哺社会，从而有利于扩大自身业务范围，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公益组织转型成为社会企业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譬如转型导致的使命漂移、经营失败、社会质疑等，需要提前防范，早做准备：

一是培养“一心为公”的组织文化。在转型社会企业前，公益组织需要先巩固好组织的公益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组织转型，从而避免后期的使命漂移。二是基于社会创新开展组织转型。在经营方式、用人方式、财务管理方式等多个层面创新以提升竞争力，从而避免经营失败的风险。三是做好公共关系维护工作。注重在经营过程中与公众分享利益，主动发声宣传，从而避免公众的质疑。

来源：敦和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Epj9z3JYYzUKcN31p0hWXQ>

魏晨：如何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硬体、软体和韧体？

编者按

2020年11月25日14:00，敦和与南都基金会将联合主办的 CFF2020 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试图从基础设施的视角，探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的关键需求和行动案例，以期激发更多行动方的参与，助力行业对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解从认知到行动不断推进。

为了更充分、深入的探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议题，我们专访了乐仁乐助

社会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魏晨，他针对该议题提出了独具一格的分析视角——硬体、软体、韧体，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发表论述：

1. 如何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其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何价值？这方面紧迫且关键的发展点是什么？

2. 基金会如何支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发展？

3. 乐仁乐助如何构建组织自身的基础设施？在推动区域慈善基础设施方面有哪些案例和经验？

一、如何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何价值？紧迫且关键的发展点是什么？

提问：一提到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不少人很难有直观的感受和认知，你对此如何理解？

魏晨：基础设施是工程类的专业词汇，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是个比喻词汇，对应到公益行业，我认为有硬体、软体、韧体三层结构。

硬体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公益行业普遍缺乏。这次疫情期间，硬体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尤为凸显。没有物流、仓储这样的硬体，公益物资无法有效输送，后面的行动也是苍白无力的。京东当初做物流体系的时候，受到不少质疑，但后期就显示出成本优势、效率优势，现在电商都在做自己的物流体系。公益行业要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种硬性基础设施十分关键。

软体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文化、组织、人才、项目等关键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它更多的代表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当中必须奠定的基础。软体基础设施当中要素间的组合方式，呈现为行业上下游、跨部门的互动机制。行业一直没有在这个层面，形成相对科学化的机制，这限制了要素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缺少这个，哪怕培训再多人，做了再多项目，最后都很难显现出满意的效益。

韧体基础设施是指硬体、软体这些基础设施具有弹性，以及形成这种弹性的机制与文化。公益组织的发展，缺少这种韧性建设，没有战时和平常的不同应对机制，就会出现需要的时候，难以应对瞬间放量的需求，不需要的时候，又难以生存，现在大家都说企业没钱了，政府没钱了，公益行业的危机出现了，这就说明公益组织缺乏弹性。

目前整个行业，无论是硬性还是软性、韧性基础设施的认知和相应的知识生产都是缺乏的。

提问：如何理解软体基础设施中的组织、项目、人才和平台？

魏晨：就组织而言，我们一般关注三种基础性组织：枢纽型组织、支持型组织、专业技术型组织。这些组织奠定了别的组织发展的基础。

因为公益领域不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是一个三角市场，导致了这个领域的信息流动不对称，所以必须有中介、枢纽的角色，促进三角市场的信息流动。

就项目要素而言，我们主要关注项目基础建设。中国公益项目经历了典型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08年开始的慈善型项目，之后是救助服务类、

应急救援类项目。第二阶段是 2014 年之后，出现很多系统性项目，在设计阶段就会产生一套创新机制、资源体系；第三阶段到社会创新领域，会追求更多的经济性效果，比如产生采购平台、众筹平台等。这是从传统慈善领域向治理领域转化过程中，必然衍生出来的项目基础建设。

人才方面我们比较看重四类人才：领军人才、职业经理人、专业技术人才和知识生产人才。以前很多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培养人才，但只有钱无法有效培养人才。领军人才不领军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都培训了十几年的领军人才了，为什么还是觉得缺。不是人才本身的数量缺，是人才处于什么环境下能发挥作用的这套机制缺。

在人才基础设施中，领域比较忽视其他三类人才，比如专业技术人才，甚至几乎无技术。以评估为例，我们可能有评估思维，认为把评估的指标列举出来之后评估就结束了。指标设计根本不等于技术，或者只是技术的很小的一个层面。指标的应用与结果转化，更需要技术。比如“满意度”指标，在青少年项目中，几乎是一个可信度非常低的指标。为什么？因为只要去调研，青少年的家长满意度都会特别高。这批家长只要有人帮他带孩子就满意。

另外一个挑战是，评估者说不清楚服务对象到底有了什么改善，可以测量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指标设计只是外在的观察性指标，缺乏内在的评价性指标。对应到医疗领域，我们到医院看病，同一个生化指标出来，有的医生觉得没事，有的医生马上就感觉有问题，这取决于医生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最后会被固化成一种形式的技术。

汶川地震过去了 12 年，对抗震救灾的介入过程当中，无论是一线的公益组织还是基金会介入性的效果，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一篇对比分析报告。这意味着 11 年过去了，我们对这个事情依然缺乏研究、缺乏评价，更缺乏技术。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存在，缺少这类技术人才，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长此以往，就很难取得公众的信任，很难取得资助方的信任。

平台要素而言，我主要讲两类代表性平台：

第一类是服务对接平台。很多跨界人士来到公益领域，觉得这个领域应该有一个淘宝，一边是公益组织的服务供给与发展需求，一边是老百姓的需求，用淘宝就可以对接起来。这是一种比较僵化模仿的心态。

这类平台缺少市场研发的动力，没有对于这一领域做深入探索。事实上就没有直接市场发动这个平台，因为居民一般出了问题会去找政府，不会直接找社会组织。现在社会组织影响力还很小，常规情况下，居民有问题先找到政府，政府觉得这是问题，再找社会组织来做，就形成一个三角过程，所以这个平台往往不是 B to C 或者 B to B，它是个 B—C—D 市场（政—社—服务对象），所谓的政社中间，暗含了第三方——服务对象，所以建构起来难度比较大。

第二类是孵化器。做孵化器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公益的角度做孵化器，另外一种是以孵化器的角度做公益。

从公益的角度做孵化器，就是政府有责任去花这个钱，这个钱的社会价值远远高于经济价值，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这种视角运营孵化器的时候效率其实不是特别高。

从孵化器的角度做公益，孵化器本身就是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生存一定取决于它的所孵化出来的组织可以获取多少资金，可以解决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但公益领域几乎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运作孵化器。孵化器从 13 年慢慢开始在全国多了以后，虽然风起云涌，坦率来说，全国的孵化器效果都不是特别好。它没有搞清楚三角市场里面这种双重的特性，政府是客户，组织是用户，所以组织不一定满意，客户也不一定买单。

提问：如何看待硬体、软体、韧体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角度，哪些要素的发展更具紧迫性？

魏晨：硬体和软体是基础，没有硬体和软体，就不存在韧体一说。当然韧体能不能发挥作用，与硬体和软体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同时韧体弹性所体现出来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过来也会决定硬体软体建设的有效性与适用性，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得更突出。

从紧迫性的角度，硬体和软体基础设施的发展建设更紧迫一点。

第一是我们长期忽视的硬体基础设施。我们一直不清楚，作为一个行业来说，哪些是我们的硬体基础设施。壹基金的救灾仓储场所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不管它的物资量有多大，但是能在瞬间起作用，就像沙漠当中送泉水。如果没有，所有的要素、行动都起不了作用。这种基础设施的投入很重，成本高，需要做长线投入。如果不做长线投入，后面还是会纠结，一些问题会反复出现。

疫情期间有些类似的问题，汶川地震已经出现过，问题不太在于经验、能力，更大的症结出现在硬件基础设施上。这种基础设施大拙若巧，如果不花大力气解决，我们碰上疫情这种会产生长投影危机的事件，就算再有项目，再有人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第二是软体基础设施层面的行业协同管理。应对重大问题的时候，基金会该怎么组织、公益领域该怎么组织，怎么跟社区对接，怎么跟其他行业互通，怎么跟政府协同……目前特别缺少有效协同的制度、机制、平台。

我们谈合作、协同也谈了很长时间，但这种协同平台怎么建，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在基础设施中还缺少关注、讨论、研究。

在大变局的背景下，行业受到波及影响，大家都说要抱团取暖，但不能稀里糊涂就抱在一起取暖，这种抱团产生的不一定是暖，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要想发挥 1+1>2 的作用，就要真正去打磨这套机制。

二、基金会如何支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发展？

提问：基金会在支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方式方法上，你有什么建议？

魏晨：建设基础设施，政府、企业、公益组织都在投入，但三个领域有不同的方法论。政府靠行政手段，靠集约化投资。企业就是投资行为，讲究回报、商

业利润。基金会投入，更看重价值产出，有点像早期的维基词典，大家都来奉献一种知识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知识平台，这个知识平台本身价值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同样做仓储，都是招投标的形式，政府和企业更看重的是物资、人力投入和最终的产出，预决算的对比等。如果公益组织做仓储，极有可能是发起一个筹款项目，希望企业捐赠、政府配套、老百姓捐款，采用社会动员的方式。这种动员的方式，更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它不是追求经济目标，而是价值引领，对于这种重的长线的基础设施投资就显得特别重要。

比尔·盖茨成立盖茨基金会，做疫苗的研发、癌症药物研发，这种很长很重的投入，除了大型医药企业为了长线回报，一般企业都做不了，但是盖茨基金会可以做，这背后也有价值引领。

其实，并不意味着投入和体量很重，我们就做不了。短期的项目化思维必然会规模小、周期短，这就决定了单一基金会做基础设施的方式方法肯定不行，需要在基金会的上游建立协调机构或者联盟体系推进，以分工协作的方式推进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而且极有可能做这些事情的人和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会，最后未必有好的评价。做生态也是，做了之后大家看不到，因为它是基础。但是如果不做，问题会反复出现。

提问：最近大家在讨论基金会是更应该资助演员、节目，还是更应该“搭台”。对此，你怎么看？

魏晨：这个讨论的背景假设是，如果基金会不资助“演员、节目”，就会非常影响公益组织的生存发展。是不是真的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基金会整体的资金体量远比不上政府、企业，所以并不是基金会不资助公益组织，就会“死”一批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更担心的是政府、企业没资金了。

这个问题的背后，需要基金会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基金会当中，做资助的只有寥寥几十家？为什么行业都不做资助，这是个大问题。

其次，如果“搭台”真的有效率，能够使政府、企业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率，也是善莫大焉。这次 99 公益日，很多人觉得政府出来跟社会组织“抢钱”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这个台搭得好，连政府都觉得在这平台配置资源是高效的。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平台，政府资源或许会有更多地投入，也有助于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与理解。

如果把“搭台”看作协同，目前业内缺少的是更大规模的协同。就数量而言，50 家基金会可以一起做什么，还有待思考。

就跨部门而言，社会组织如何跟政府有效协同，一起应对类似养老这样的重大社会议题，有效地发挥公益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三、乐仁乐助如何构建组织自身的基础设施？在推动区域慈善基础设施方面有哪些案例和经验？

提问：乐仁乐助组织运转的底层支撑，如何发展起来的？

魏晨：我们最早在无锡做一个青少年困境儿童项目（向日葵困境儿童专业社

工援助项目），当时用的一套煤矿矿山危机管理系统，第一次感觉到工程类的项目管理套用到管理公益项目的时候，有很大问题。公益项目管理，不是单纯的项目进度控制，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关注人的变化。基于此，形成了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副产品”乐仁乐助的公益项目管理思路。

后来逐渐发展，中国公益组织与源自于美国的 NGO 管理方式有很大差异，我们不是先有使命愿景再到战略。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组织而言，价值管理和价值赋予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把价值的塑造、人的成长作为我们机构核心的战略管理当中首要关注的内容，才能形成有认同的组织使命与愿景。于是就形成了第二个“副产品”，通过做项目把一个有使命的团队做出来，通过做团队把一个体现组织使命的组织架构做出来。

第三个“副产品”是做知识生产。我们可以用知识的工具来带动整个项目的影响，进而获得在谈判过程中议价的可能性。其实那个困境儿童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运作了 8 年多的时间，获得了各项评估、评奖的认可，我个人也觉得项目生产与质量控制非常出色。

回溯下来，我们一开始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就不是按照传统的公益思维去做的，也不是按照传统的社工的角度去做的，而是以项目为切口来产生自己的新管理、新知识。

基于此，也形成了我们的机构愿景“再生产社会”，“再”是迭代创新。我们一直强调的“改变”就是不断用生产的方式做出来。在这过程里面，也产生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治理结构。

也就是说，乐仁乐助做项目不仅仅是在“做”项目，是在做项目同时做自身的生产，社会的生产，通过一个项目培育一个团队，形成一个品牌，塑造一个生态，内化一个价值，推进管理、文化、价值、结构等深层次体系的有序变革，这种发展，称之为项目为根的底层推动发展方式。

提问：乐仁乐助在区域开展了很多支持性的工作，在推进区域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上，有哪些策略与经验？

魏晨：任何一家组织，任何一个行业，很难推进一个全国性的变革。但是我们可以做小生境，因为小生境具有生产性特点。

我举一个武汉的例子。乐仁乐助是 13 年进入武汉的，当时大部分都是社工机构和传统的义工联。我们去了以后，先把孵化器给搭起来，推进四类人才（领军人才、职业经理人、专业技术人才和知识生产人才）的四年成长计划，从实务到精英到卓越再到领军。

接着配套四年项目工程，组织了媒体的公益观察团，与企业搭建小型公益交易会，建立与本地基金会的合作关系。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把整个生态链条搭建起来。在这些工作当中，媒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用流量直播的方式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乐仁乐助重点在于把握节奏，发掘大家的兴趣点，设计好引爆点，并且预判哪个地方会引发关注，哪个地方可能社会组织会比较关注，哪个地方政府比较关

注。节奏性安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并非齐头并进，而是有层次、有递进，我们把它称为“结构洞”策略。“结构洞”的把握和规划设计特别重要，某些结构动力也会引发后面不同的结果，甚至后面的进程都不需要用力去推。

总结来说，进入一个区域，权力体系、资源分配体系、社会要素分布体系这些都要考虑。在参与主体上，要关注政社协同。然后是资源分配体系上，除了政府之外，要关注企业性资源、社会性资源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源。整体上，我会比较关注整个脉络组合和系统推进情况。

提问：乐仁乐助的治理结构背后是怎样的价值理念？

魏晨：乐仁乐助的治理结构是理事会、监事会在中间，上边还有代表大会和自治委员会。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有点类似于社团的治理结构，自治委员会监督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自治委员会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提案，用提案的方式来促进机构发展过程当中福利平衡的问题、员工成长问题，进而促进机构的变革。

比如说自治委员会提出人才发展口号“三年60%的硕士化”，现在基本能达到30%，机构出学费支持员工学习。公益机构的女员工多，自治委员会的一号提案就是专门针对女员工的提案，产假休完之后，还可以晚上班半小时和提前半小时下班，家里没有人带孩子的，可能又不愿意请保姆的，我们就允许她是不是可以带孩子上班，或者只要提出申请，在家办公都可以。

我们相信价值要通过组织结构（制度）来实现。所以这个权利的赋能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而是结构化的。

之所以采用这种治理结构，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是高校老师，早期的团队成员都是我的学生，随着师生关系转化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必须要在治理结构上避免老师的过度权力，所以限制理事会是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因为我们在法律当中有个天然的缺陷，包括欧美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没有制约，向谁负责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表达。它不像企业管理层和决策层，股东代表大会对股东负责，董事会管理层向董事会负责，有非常明确的制约结构。乐仁乐助自治委员会以及未来的联合总干事委员会就是这样制约理事会的架构。不相信个人的道德约束，而是相信制度与结构的有效性，这是治理结构背后的价值理念。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内部的合理性的梳理，管理的梳理，这些形成内部性合理性的机制后，就会呈现出外部性的效果。内在机制会传递或者传播或者强化背后的价值理念。怎么才能让员工相信组织是大家的？必然是员工在治理结构中，拥有合理的权力才行。同理，社会组织的管理要避免僵化、程序化的科层制管理，有更多的授权机制，所以要特别强调质量标准和契约精神。这些也是治理结构背后的价值理念。

来源：敦和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fZ9OF-iMtY9xnqQOvbYDLA>

郑功成：慈善无国界，但慈善事业有国界



导语：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功成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成效、问题与制度完善》的文章。该文洋洋万言，全面回顾总结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成效与不足，对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郑教授讲了许多深刻、精彩的观点，其中不乏一些亮点金句，小编特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1. 慈善事业不仅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而且是值得政府与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有益于国和民的社会事业，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

2. 《慈善法》实施四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正在进一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有限的政策性文件规制走向法治、从少数人关注走向大众参与。

3. 社区慈善与网络慈善蓬勃发展，社会成员的慈善参与意识被空前激发，社区与网络成了大众参与慈善活动的重要渠道，我国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4. 我国慈善事业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有生力量。《慈善法》实施以来，包括款物捐献与志愿服务在内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得到了提升，慈善事业在服务大局、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应对和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慈善信托成为一种新的慈善形态。慈善信托虽还未进入规范发展轨道，但作为一种慈善制度创新，从零起步到逐步发展，无疑是我国慈善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标志。

6. 在肯定慈善事业发展并取得相应成效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慈善事业总体发展滞后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7. 依法认定和新增的慈善组织发展缓慢。一方面，在全国社会组织中，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占比严重偏低。另一方面，新增慈善组织在逐年减少。社会组织转换成慈善组织的积极性不高，新增慈善组织数量呈逐年递减的态势，表明法定慈善组织并不具有吸引力。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将可能因缺乏足够载体而陷入发展停滞。

8. 慈善资源动员能力依然有限。以慈善事业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和个人财富共享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9. 目前，我国慈善领域还缺乏应急机制和协调能力，也缺乏真正有协调能力并能起引领作用的枢纽型慈善组织，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很难及时高效地使用慈善资源。

10. 慈善领域的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不足，透明度不高；多头募捐、欺诈募捐及募捐财物“跑、冒、滴、漏”等现象并不鲜见，强行摊派募捐现象仍有发生。此外，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在履行自己职责时亦存在着不足，并未真正体现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本宗旨。这些现象表明，慈善领域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化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11. 慈善组织由双重管理改为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制，是为促进社会各界举办慈善事业，但慈善组织认定很少与新增慈善组织数量逐年递减的现实，表明这一立法意图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12. 尽管《慈善法》明确指出民政部门主管慈善工作，但相关政策支持却并非民政部门可以决定，还需要财政、税务、海关、银保监、网信、教育、宣传等多个部门同步出台相关政策，目前并未形成有效的合力。在缺少授权的情形下，如果相关部门不能积极有效地配合，仅靠民政部门作为，《慈善法》的相关规制就难以落地。

13. 慈善监管存在着监管不足与监督过度并存的现象。调研发现，监管不足主要表现在民政部门的监管能力不足、推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同时，监管部门对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存在干预过度的现象，如对慈善组织的章程制定不是侧重于章程宗旨与使命及法定事项的监管，而是要求内容几乎一致，甚至规定慈善组织负责人任期不能超过两届、年龄以70岁为上限。这实质上是接近于对机关事业单位和行政干部的管理方式，剥夺了慈善组织应有的自治权，与鼓励人人行善、终生行善的立法追求不一致。

14. 《慈善法》实施以来，网络慈善在快速发展，社区慈善在遍地开花，个人求助已不满足于传统的亲友或邻里圈子和交往有限的微信朋友圈，而是借助网络平台走向了互不熟悉的公众。实践表明，网络慈善、社区慈善是我国目前最具活力、实践效果与发展前景良好的慈善事业发展方向，但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制与政策支持，可能容易因不良的个案而使整体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到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势头。

15. 尽管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慈善组织数量不多，

发育成长缓慢，不仅缺乏规范化的内部治理机制，更缺乏专业人员参与。

16. 慈善行业组织发展滞后，中国慈善联合会作为行业组织的功能有待提升，地方慈善行业组织普遍能力不足，而采取一级只能有一个慈善行业组织的做法也不利于慈善组织自发联合并有效协同局面的形成，这使得慈善领域缺乏行业组织代表慈善行业发声并加以自律及维权

17. 我国的慈善理论与政策研究也非常滞后，不仅专业研究者数量稀少，而且缺乏求大同存小异的格局，既有成果呈碎片化，对健全完善慈善制度缺乏影响力，这必然影响到慈善事业的发展。

18. 我们必须明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慈善无国界，但慈善事业有国界。

19. 慈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成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公益事业，关键在于它不再是零星的、传统的爱心善意的释放，而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求，不断成就的有规模的、专业化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而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有效支撑。包括财政税收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均会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20.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我们可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在国家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确立定位并发挥独特功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合理定位，即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来源：善达网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IT7QoPaBvOgppwRPYWHbBg>

★山商实践探索

正确认识公益慈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在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进程中，公益慈善的地位作用必将日益突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加强理论研究，提高认识水平，在实践中大力推动。

一、必然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会议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做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由此可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分配制度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而关于分配制度，要求在重视传统的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同时，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而关于第三次分配，则强调了要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样，公益慈善和第三次分配被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要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同时再次强调，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而言的，第一次分配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第二次分配强调的是政府的作用。人们通常把市场的作用称作“看不见的手”，把政府的作用称作“看得见的手”。资本主义从萌芽开始，就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市场的力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问世以来，人们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日益迷信，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深刻证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当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以后，人们对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依靠有加，并且屡试不爽，尤其是在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更是成了“救世主”。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几乎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市场的重要性认识日益深化，市场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我们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主要得益于“两只手”作用的协调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公益事业，公益的作用突显了出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发挥好市场、政府和公益3个方面的作用，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稳定、健康和充满活力，行稳致远，以德治国也将进入新境界。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此进入了从“两只手”到“三足鼎力”的时代，要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力公益的协同作用。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慈善等公益事业会相应地活跃起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2020年12月19日表示，我国全年经济总量将突破100万亿元。人均达到1万美元左右，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社会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均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特别是社会上涌现出大批经济效益好的大企业和大批成功的企业家，强调公益慈善的时机就成熟

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以及普通大众,有能力、有意愿从事社会公益事业,通过建立基金会、捐赠等慈善方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参与社会治理。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但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相当的水平,公益慈善对社会财富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候,强调第三次分配和公益慈善才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公益慈善一直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如影随形地相伴而生,这既是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人们精神文明进步的结果。当我们强调公益慈善必然性的时候,我们也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我们绝不能陷入宿命论,被动地等待规律发生作用,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能动地去顺应规律和利用规律,促使规律发挥现实作用,向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要扩大宣传,加强教育,大力引导,激发人们的公益慈善精神,使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中来。

二、主导性

“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慈善单独列举出来,一方面说明慈善只是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另一方面也说明慈善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突出重要性。中国人的习惯通常是把公益慈善合而用之,在不严格讲究学理的情况下,在叙述中为方便起见,一般可以笼统地使用“公益慈善”的概念。

从组织的角度,公益慈善机构属于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是“第三部门”。相对于市场和政府,公益慈善具有特殊作用。通常情况下,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进行扶贫济困、关怀弱势群体等,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中外历史的经验启示我们,在经济社会还不十分发达时候,公益慈善事业也不可能发达,相对于政府和市场,公益慈善往往起着辅助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文明程度的提升,公益慈善的力量不断壮大,其作用范围日益拓展,能力日益增强,在许多方面逐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诸如公益设施、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教育科研、社会福利、养老敬老等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仅是起到补充、辅助的作用,还可以在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

我们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各界,包括理论界,需要共同努力,大胆开拓,要认清第三次分配和公益慈善的功能作用,实现三次分配共同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不同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民间性

第一次分配主要由企业进行,依靠市场,强调效率;第二次分配主要由政府进行,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注重公平;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公益

组织进行，通过开展捐赠等公益活动，主要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和奉献的精神。企业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支撑力量。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第一责任是创造价值，增加利润，但赚钱绝不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成功的企业，不仅是经营管理的典范，也需要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进模范。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大都设立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相关事务，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扩大企业社会知名度。

企业家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许多公益慈善事业都是企业家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奉献出来推动的。公益慈善精神是企业家的重要素质，衡量一个企业家是否优秀，既要看其所负责的企业创造的经济效益，即看他的企业在实力排行榜上的情况，也要看他个人在公益慈善榜上的排名。社会要加强宣传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尊敬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企业家自己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要正确认识和理性对待公益慈善事业的民间性。民间性不是不要政府，陷入无政府主义。恰恰相反，公益慈善事业要实现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管。

首先是引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显著优势，是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其它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一样，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动，否则，只靠民间力量的自我发展，很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还面临许多困难，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健康有利的环境氛围，法律、政策、制度、人才等存在许多制约。需要政府在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弘扬公益慈善精神，引导提高公益慈善意识，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是维护法制环境。政府要充分发挥法制权威，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环境。加强立法，建立健全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执法，维护合法权益，打击非法行为。强化日常监管，严格登记、监管、执法等行政行为。

公益慈善的民间性，还体现在政府对公益慈善的参与方式方法上。政府要大力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但不一定要直接办公益，而应该创造条件，让公益慈善机构本身能够茁壮成长、健康发展。

四、公益性

公益慈善事业的公益性，是指其利他性，是为了一个群体、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及至全人类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但公益性、非营利性并不是完全否定必要的经济收益。小的公益善款可以设立专项基金项目，往往可以通过本金使用，直接投入到具体公益慈善活动，本金使用完项目即宣告结束。但较大的公益善款往往要设立专门的基金会，通常不运用本金直接开展公益项目，而是

通过运用本金的投资，实现保值增值，并主要靠投资收益开展项目，进行长期运作。

公益性、非营利性也十分强调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即政府通过转变职能，逐渐回归政府职能本原，而把那些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部分，通过向公益组织购买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的目的，而不再由自己直接提供服务。政府购买公益服务的方式，是国际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惯例。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减轻政府的负担，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同时，还可以很好地体现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增加公益组织的经费来源，提高专业水平，促进公益慈善组织尽快发展壮大。

社会企业是近年来兴起的新生事物，这类企业首先是企业，即是企业法人，按照企业来组建和运营。但这类企业又不同于一般的传统企业，根本不同在于这类企业的发展目标不是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盈利主要不是用于股东分红，而是用于公益慈善事业，或者用于再投资，进而进一步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善经济的概念近年来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除了社会企业本身，老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都可以成为善经济。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项目，都可以采取公益的方式解决，既可以创造社会价值，也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公益性与商业性、赢利性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互相排斥。同时，我们看到，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社会就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目前为止，我国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员有一千万左右。

五、自愿性

从事公益慈善必须出于自愿，不能被强迫。更多的企业和社会成员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发达的公益慈善事业，是道德力量的作用，而政府公共服务体现的是行政力量的作用，其背后是政府的强制力。这也是公益事业与政府行为在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的根本区别。

经济增长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加强和扩大公益慈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公益观，提高全社会的公益慈善意识，形成浓厚的公益慈善氛围，从而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自觉自愿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公益慈善事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公益慈善越发展，社会越文明进步；社会越文明进步，公益慈善事业也就会越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的增长，财富管理行业正方兴未艾，公益慈善事业也已经成为财富管理行业的重要方面。公益慈善事业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富裕家族的日益关注，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成为个人和家族分配财富的重要选择，成为家族传承的重要内容。金融机构和其它新兴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在财富管理服务中，大都开展了公益慈善服务内容，为客户全面合理配置资产，

既保证财富的保值增值，又积极投入公益慈善活动，为个人、家族、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维护良好声誉，增加无形资产。

六、大众性

公益慈善的主体力量，应该是最广泛的大众，这就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大众性。

社会的高度文明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公益慈善精神是极其重要的内容。社会成员对公益慈善参与的程度，即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企业家等富裕人士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地区，在经济不发达的发展阶段，尤其如此。但公益慈善不应该仅仅是富人们的事情，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树立公益慈善意识，提高公益慈善的自觉性。只有当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公益慈善事业才能够健康持续发展，才能够促进社会向更高层次、更高文明进步。

公益慈善不仅是金钱和物质的事情，更是精神和道德的事情。关键在于全社会要形成广泛的仁爱、慈善的意识，对公益的参与，既可以是金钱的捐献，也可以是自愿服务等各种奉献的表达。

公益慈善应该成为全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成为一种社会理念，一种社会风尚。要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不仅是更多的富人，也包括更多的普通民众。提倡人人公益，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受益；即人人都要关心他人，热爱祖国，奉献社会。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要有公益慈善精神。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我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展望“十四五”和2035 经济社会发展远景目标，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必将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客观基础。全社会都需要共同努力，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巨大潜能有序地化作现实力量，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广泛地、健康地、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

七、专业性

面对公益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公益慈善的专业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公益慈善事业的管理人员、普通工作人员，不仅需要较高的道德修养，有较强的爱心，还需要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公益慈善活动从资金的募集、运营，到项目的策划、实施、监督，再到人员的招募和管理等等，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从总体而言如此，到每一个具体项目也是如此，如养老、助残、救助、救治、卫生、环保等，都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也需要专业的管理技能。

我国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员约有一千万人，同时，我们要看到，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不仅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公益慈善事业，既包括传统的扶贫济困的社会工作，

也越来越多的涉及资金运作等金融、商业事务，需要更多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人才。

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公益慈善的专业化。要加快公益慈善教育的发展，开展相应的在职教育、学历教育，加强对公益慈善管理人员和技术员甚至自愿者的教育、培训、训练。要在高等教育中开设公益慈善专业，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加快人才培养，既要开展系统的学历教育，也要开展急需的专业培训，为公益慈善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八、创新性

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是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公益慈善事业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与时俱进，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互联网的应用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面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我们要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促进公益慈善事业更好地发展。

技术的进步，使得公益慈善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当今时代，利用先进方便的信息通信手段，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同时，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方式也更加方便灵活，这样就使得公益慈善的大众性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会鼓励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中来。

当然，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为一些不法之徒的不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诈捐”“骗捐”“强捐”等乱象时有发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必须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提高防范意识，严厉打击不法行为，营造良好的公益慈善网络生态环境。

公益慈善制度和机制的创新，不仅表现在与时俱进，更主要的是体现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事业已经被上升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对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坚持中国特色。

九、自律性

公益慈善组织的自律性，是指其要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其存在的根本，没有了公信力，公益慈善组织就无法生存下去。

他律很重要，但自律是根本。增强公益慈善组织运行的规范、公开、透明，

是其取得公信力的必由之路。监管部门要强化履职责任，加强监督管理。公益慈善组织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部管理，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特别是注重引进专业人才，强化专业培训，提升专业素质。

公益慈善组织要正确处理与慈善家的关系，既要尊重慈善家的意愿，又要恪守公益的原则。慈善家也要尊重公益慈善机构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干预公益慈善机构的具体事务，保障其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企业、民众、媒体、慈善家、公益组织本身等，都要共同努力。只有形成良好的整体氛围，才能不断提升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使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才能保障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十、国际性

现代公益慈善事业，许多国家的发展较为成熟，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当然，在虚心学习借鉴的同时，我们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道路。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时代，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决定了公益慈善事业也日益国际化。公益慈善的国际交流合作具有广泛的空间，如应对老年社会、消除贫困、减灾防灾、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预防、网络安全等许多方面，都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特别是在人才交流、经验共享、教育培训等许多方面，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必须认清这样的大趋势，积极应对，趋利避害。

中国传统文化中饱含许多公益慈善方面的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全人类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优良的公益慈善精神，更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益慈善事业。

在国际交往中，政府、企业、公益组织都有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各类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发挥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各类基金会的作用。公益慈善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公益慈善组织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要充分利用好。

作者：白光昭 山东工商学院党委书记

来源：《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35（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3796813798828&D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BXYX202101002&RESULT=1&SIGN=AmBMn8WLjAUCyqPC5kGrCj9EM64%3d>

财商教育初探

摘要:财商教育是一种以社会财富为研究对象,引导人们如何正确认识财富、获得财富和管理财富的过程。青年财商状况直接影响到国家核心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加强青年财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从国际比较看,越是发达国家,越重视财商教育,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财商教育,我国的财商教育起步较晚,在各地发展并不均衡,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了更好的加强青年财商教育,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应共同努力,打造“四位一体”的财商教育模式,切实提高青年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

关键词:财商教育; 财富管理; 路径;

一、财商及财商教育

1. 财商的定义

财商(Financial Quotient)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提出。他认为,财商是一个人在财务方面的智力,是理财的智慧,其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正确认识金钱及其规律的能力;二是正确使用金钱的能力。

一般而言,“财商”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的“财商”,其本意是“金融智商”,英文缩写为FQ(Financial Quotient),它是指个人或集体,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包括财富观念、理财行为、金融知识三个方面。包括获取财富的目的、获取财富的方式、接受的财商教育等。广义的“财商”,是指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根据市场规律,创造财富、管理财富和运用财富的能力。财商的要素主要由市场运行知识、创造财富能力、管理财富能力三个方面构成,具体包括经济学知识、投融资能力、创造财富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等。广义财商和狭义财商的主要区别在于:广义的“财商”,对财富的理解不限于“金钱”,包括所有的财富,甚至国民财富;而狭义的财商,对财富的认识仅限于金融范畴。

2. 财商教育

对财商教育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中叶。有研究者梳理了这一研究最初的脉络:“1958年,英国学者旦茨格(Dancige)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对经济生活不同领域的理解与孩子们是否有相关的经验有关”。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于1982年首次科学系统地提出了理财教育的概念。他指出,“理财教育就是能够让人们学会如何设立理财目标、认识个人收入基础、制定详尽的达到目标的理财计划、应用理财计划、调整理财计划、评价理财目标和理财过程的一系列环节”。此概念的提出,为财商教育在美国的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家经济教育理事会(NCEE)于2003年指出,公民作为消费者、生产者、工作者、投资者等多重角色,需要有充分的经济素养去更好地理解世界和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决策。网络杂志《EnGauge》在同年发表的《21世纪数字化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中,把财商素养作为21世纪的重要素养

之一。

在国外，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财商教育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财商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与此同时，财商教育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也受到了相关专家和学者的认同及肯定。美国教育学者 Maman Daniel 对美国的财商教育进行了有效的分析，他认为财商教育的关键在于教育的个性化。Jonathan Fox 认为财商教育的主体作用在于充分发挥其社会组织性，政府要进行法律和监管等方面的配和。Federico Triol 则认为“财商是指对理财及财务等方面的智力，财商与情商、智商已成为当前社会必不可少的素养和能力。财商教育侧重财富观念教育、财富知识教育、财富心理教育和财富管理行为教育”。

在国内，郭建芬提出财商教育的理念应该是“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和发展奠基”，大学生的财商教育以及财富思维和财商素养的培养对学生的财富观、道德观的正确树立有着重要意义。洪明认为“财富”教育是财商教育的核心，财商教育是学生认识财富、创造财富、使用财富的教育认知活动。潘香君则提出教师在课堂中应该有意识的对学生渗透财商教育，理解和认知关于财商教育的内涵和教育体系，实现学生财商教育模式的建构。在当前的财商教育问题上，黄雯提出财商教育在社会的认可度相对较低，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财商教育被单一化和边缘化。陈勇在对国外的财商教育进行了有效的研究，他提出了财商教育要实现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

由此可见，财商不仅为财经人士所必需，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财商教育不仅仅是金融教育，也不完全是消费者教育，它包括生活教育、生涯教育、情感教育、思想教育等。财商教育是一种财富管理教育，是一种财经素养教育，是财经教育领域的科普教育和通识教育。

二、财商教育的意义

实践证明，青年如能在早期形成良好的财经习惯，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那么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尤其是自我管理、时间管理、金钱管理、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挑战，他们将有能力 and 智慧积极应对。

1.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财商教育的目标，就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基础财经知识、理财能力、财富道德与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财商教育不仅关注思想道德教育、还关注生活教育、情感教育、心理教育等。青年阶段是财商教育的最佳时期，良好的财商教育能养成学生良好生活态度、树立的正确价值观念、形成优良的品格、积淀文化素养和培养责任意识等。培育青年形成健康的财富观，帮助他们掌握必要的金融知识、理财知识和理财技能，是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

2. 加强学校素质教育的需要

有证据表明，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学习成绩并不是影响个人成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个人综合素质已成为影响个人成长的最关键因素。综合素质包含很多方面，财商素质无疑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对青年进行财商教育，提升其正确获得、使用和保管金钱的能力，改变其不善于理财保值的行为，有利于提高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把财商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将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理财技能、丰富学生的理财知识、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坚定人生理想信念，将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3. 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青年的财富观和财商教育状况将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树立正确财富观，对于个人、家庭、社会都非常重要。在国外的财富观中有句经典名言令人深思：“尽你所能的赚钱，尽你所能的省钱，尽你所能的捐钱”。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应该学会勤奋工作，尽力赚钱。不仅能通过自食其力改善生活品质，也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但有钱也不能浪费，应使其效益发挥最大化。人类居住的地球资源十分有限，学会节省，尽量省钱，就是为人类节省资源。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是来自于社会，也应该回报于社会。推动青年财商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稳定器。

4.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青年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关键对象与承载者，因此，注重培养青年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青年教育的重要内容。2018年，为落实“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法定要求，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构建完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体系中包含了财商教育所涵盖的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培养青年的经济安全意识，让青年能够认识到当前本国经济安全的内容和特点，以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从而掌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知识和方法，在遇到安全威胁时，能够做到保护本国经济安全”。具体而言，在财商教育中应让青年意识到经济实力的较量是当前各国争夺的重点，意识到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各方面挑战，意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等核心利益的斗争从未间断。切实认识到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等方面，党和政府有力地捍卫了国家的核心利益，推动实现了区域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

三、西方国家高度重视财商教育

西方国家的财商教育萌芽于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的衰退使人们特别关注自身财富的保值增值状况。从国际比较看，越是发达国家，越重视财商教育，并从事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予以对待。

1. 美国建立比较完善的财商教育体系

美国是较早将财商教育纳入常规教育体系的国家。据初步观察，20世纪50年代后，可称之为“试水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州政府在大学和中学试点开设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相关课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财商教育逐渐形成，针对青少年成长不同阶段财商教育发展的需要摸索出了一些规律，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就是在青年不同阶段设立了不同的教育目标。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财商教育进入深化阶段，财商教育理论和实践得到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

代，罗伯特·清崎《富爸爸穷爸爸》一书出版书中最先提出“财商”概念。这之后，美国财商教育理论和实践逐步成熟，并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特别在国家教育政策层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典型的事例如：1994年通过《联邦中小学教育法案修正案》，标志着政府正式将财商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进入21世纪对财商教育的重视几乎成为美国的国策。从2001年起，美国3000所中小学参加了美国教育部资助的“为美国而储蓄”计划，大力普及和深化财商教育。2003年颁布的《金融扫盲与教育促进条例》，正式把全民的金融教育纳入国家法案，把财商教育列为小学、中学12年学校教育必修课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财商教育已经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家战略到社会生活，得到了体系化的发展。逐步形成以学校财商教育为主，社区、家庭和财商教育机构联动的多层面、全方位的教育模式。

2. 英国政府大力支持财商教育

英国财商教育也起步很早，至少在2009年议会跨党派小组（APPG）调查提出，个人财商教育应作为学生学校课程的必修内容。英国政府推动青年财商教育的进行主要是通过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地方政府来实现的。研究者指出：“苏格兰政府要求将个人财商教育融入现有课程中。课程在关键目标中指出，青年理财能力的培养包含于每个孩子的通识教育内容中，学校应把财商教育内容融入数学计算的教学中”。在这些政策影响下，多地财商教育实践几乎同步铺开。如“2007年，北爱尔兰引进了适用于7至16岁学生的修订版课程，在这课程中理财素养被定为法定素养”。“2008年，威尔士金融教育部门（WFEU）成立，WFEU在国家学习网（NGFL）经营者提供的教学资源的支持下，引导和建设财商教育网站促进财商教育知识在社会的传播，支持青年财商教育的区域数据库也在同步开发当中”。同时，支持中小学跨学科财商教育的项目计划和相关教材的编写也在有序进行。

3.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财商教育

在日本，素来就有重视财商教育的传统，从政府层面到民间社会无不如此。从实践角度说，日本政府认为学校应承担起青年财商教育的主要任务，应该让孩子们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在实践中学习金融知识与技能。日本的中小学校普遍进行正确认识金钱的启蒙教育。东京证券交易所编撰的名为《股票学习游戏》的教材，已被上千所中小学采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更将对财商教育的重视上升到立法层面，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来推动青年财商教育的发展。日本议会在充分肯定加强财商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了《消费者教育促进法》。要求在高校甚至中小学开展消费者教育，帮助学生制定具有前瞻性的人生规划，并提高他们社会真实生存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其他国家也积极推动财商教育

澳大利亚2005年出台的《消费者和财经素养的国家框架》中，财商教育覆盖的学段从幼儿园到十年级；俄罗斯形成了教育内容贴近学生学习和现实生活实际的财经教育特色，注重培养学生实际运用经济知识的能力；加拿大、新加坡等

50 多个国家也都相继制定了财经素养国家战略；2012 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首次评估了 15 岁学生的财商素养，为财商教育在全球推广掀开了新的篇章。

四、我国财商教育的现状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财商教育，我国财商教育起步较晚。目前青年常见的理财误区有四个：守财囤积、大手大脚、炫富攀比、无欲无求。针对上述问题，应引导他们学会消费，学会节约，学会储蓄，学会记账。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重要文件，并将金融知识普惠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国民财经素养。

1. 我国财商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财商教育起步较晚，发展也很不均衡。夏义勇等人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西方理财教育思想的传入，理财理念才为人所关注。我国接触并深入研究财商教育，是从《富爸爸穷爸爸》系列书籍的引进之后开始的。但对财商教育的概念、意义、目标、内容及途径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广度和深度还明显不够。教育界对财商教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小学阶段，对中学财商教育研究较少。2014 年 10 月，中国教育学会财商教育中心成立，表明我国财商教育迈出实质性步伐。2015 年 9 月起，广州市 36 所中小学在国内首批试点开设金融理财地方课程，财商教育进入学校课堂。2016 年 6 月，全国第一批财商教育实践基地设立，为加强青年财商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 年 5 月，清华大学首次发布了针对中国 90 后大学生的《中国青年财商认知与行为调查报告》。2018 年 1 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中国财经素养教育协同创新中心首次正式发布了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的《中国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这是国内第一份系统的、学段相对完整的财经素养教育标准框架。该标准框架从收入与消费、储蓄与投资、风险与保险、制度与环境、财富与人生 5 个维度及 13 个结构全面阐述了不同学段学生应该达到的素质和能力。该标准框架充分考虑了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发展目标，兼顾了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 家庭财商教育意识匮乏

家庭在青年的理财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家长缺乏这种意识，家长关注的重点是孩子的健康和学习。从小到大，除了保证孩子身体健康以外，就是让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早教班、辅导班、课外兴趣班，对于财商教育认识偏颇和理解错位。仍有部分家庭认为孩子唯一的任务就是取得优异成绩，其他都不重要。同时，部分家庭对孩子过于宠溺，缺少基本的家庭理财意识教育和人文关怀。他们甚至认为自己那一代人并没受过财商教育也自然而然学会“理财”，因而轻视理财教育。诸如此类陈旧落后的投资理财意识和教育观念，严重影响了对青年管理财富能力和创造财富能力的培养。

3. 学校财商教育边缘化

目前，财商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还是处于一片空白。尽管素质教育不断得到加强，但受中国传统重义轻利文化的影响，财商教育一直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学校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理财教育内容比较缺乏。学校教育中与理财有关的内容，只是零星地散见于部分课程中。虽然在经济、教育相对发达的广州等东部沿海地区，青年财商教育已经引起重视，但还是一种碎片化的学习，缺乏系统化、全面化、科学化的财商教育。现行教育体系对财商教育的缺失，导致学校和老师对财商教育不重视，严重阻碍了财商教育的发展。同时，许多学校缺乏理财师资，不能开设面向所有学生的财商教育课程，财商教育走向教育体系的中心仍需努力。

4. 国家、社会层面的财商教育形式单一

我国传统的育人理念中对“财”持有鄙视与不屑的态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视金钱如粪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封建教育观念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现行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对理财教育的忽视。此外，在青年财商教育上，我国在国家战略上以及政府引导上都缺乏有指导意义的战略规划，缺乏理财教育方案等相关政策的支持。同时，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开展的理财教育活动还相对较少，财商教育缺乏有效的实践平台。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财富观也有所转变，但社会层面对青年的财商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导致部分青年走上社会后容易掉进“金融陷阱”，甚至出现因无力还债而走上绝路的现象，令人痛惜。

五、加强财商教育的路径

近年来，财商和智商、情商一起列入了青年“三商”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财商教育也成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为更好的加强青年财商教育，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应共同努力，打造“四位一体”财商教育模式，切实提高青年认识、创造和管理财富的能力。

1. 政府主导是财商教育的关键所在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要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财商教育体系，形成政府主导、学校参与、社会协同、家庭支持的合力，把财商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在政府层面予以引导和推动。教育主管部门要同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和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商教育总体规划，及相应的实施措施，如教育目标、课程内容、学习形式、教育计划、教育标准等，把加强财商教育纳入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编写财商教育规划教材，作为社会公民财商教育的重要内容。政府要引导搭建网络教育平台，针对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等不同群体开放课程，鼓励分享，努力实现合作共赢的教育目标。

2. 家庭教育是财商教育的逻辑起点

家庭是青年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场所，父母的言行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工作等会产生重要影响。父母对待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尤其对待财富的态度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在成长过程中，青年会学习和模仿父母的态度与行为，从而内化成个人的素质和习惯。在关系和谐、亲密民主的家庭环境里，青年对待财富的观念和

态度积极健康，并善于、乐于理财实践，效果良好。在充满溺爱、冷漠和封闭的家庭环境中，青年则对生活和学习丧失信心，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对理财实践缺乏情感认同和积极尝试，效果较差。加强青年财商教育，应弥补家庭财商教育的缺失，父母以身作则，合理消费，不让超前消费、攀比消费、享乐消费等不良消费习惯和观念影响子女。适时通过有计划地消费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良好的消费习惯，改善其不良消费行为。同时，可让孩子知晓家庭的经济情况，并参与到家庭的理财计划中，潜移默化地加深子女对理财行为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储蓄、投资的正确认知，不断提升其财商水平和理财能力。

3. 学校教育是财商教育的主要阵地

学校教育是学生接受一系列系统知识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全面提升学生智商、情商和财商的重要场所。财商教育需要全面纳入学校教育教学体系，才能体现其核心素养教育的基本职能。当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学校发展情况各异，对财商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学校相关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差异很大，学生的财商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需要通过改革教育模式，制定青年财商教育总体规划，把财商教育纳入到青年教育体系中，并将其作为评定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指标。建立培养学生财商意识的长效机制，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确定不同的财商教育目标，使学校财商教育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进行资源整合，调整现行教学大纲，针对青年的特点，认真编写财商教育教材，把财商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行教授。积极培训相关师资，提高财商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4. 社会支持是财商教育的重要保障

提升青年的财商教育应纳入国民教育计划中，其实施有赖于社会支持系统。国家是财商教育的顶层设计者，应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制定国民财商教育计划及财商教育标准框架，出台相关法律和政策，为财商教育指明方向、指明路径。社会各方应积极达成共识。明确职责，通力合作，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发挥各自功能和优势，为青年财商教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等可组织青年参观学习，并开发针对青年的金融理财产品及服务；专家学者、专业组织如经济学会、全国各种教育组织、经济学家应对青年财商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帮助。要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途径，积极传播健康的财富观、消费观和理财观，提升社会大众对财商教育的重视程度，为财商教育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作者：刘向锋 山东工商学院副院长

来源：《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35（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3807636191406&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BXYX202101003&RESU
LT=1&SIGN=A6V70tPTA2UVb2JTxe%2bPL3jPgBU%3d](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3807636191406&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BXYX202101003&RESU
LT=1&SIGN=A6V70tPTA2UVb2JTxe%2bPL3jPgBU%3d)

世界的本来面目：我读《“错误”的行为》之一（1）

《“错误”的行为》的作者是理查德·泰勒，泰勒于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错误”的行为》是泰勒的代表作之一，共分为八个部分33章。



一、行为经济学的发轫：1970~1978

1. 经济人与非理性的人

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是人们做选择时会遵循最优化原则。经济人做选择时的依据会被视为没有偏见的，也就是说，他们做决定时会基于“理性预期”。

“约束最优化”是指在有限预算的前提下做出最优化选择，其前提与经济学的另一理论——“均衡理论”的前提可以结合起来。可以说“最优化+均衡=经济学”。然而，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有缺陷的。首先，当普通人碰到最优化问题时，往往无法解决它们，甚至离找到解决方案还差得很远。其次，人们做选择时并不是没有偏见的。当经济学家所做的预测必须十分精确，且其判断依据是所有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时，他就会陷入麻烦。

一大群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经济学家已然涌现，他们愿意冒险，摆脱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丰富经济学理论。这一新兴领域被称为“行为经济学”，它与经济学并非分属两门学科，而只是融会了大量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内容的经济学分支。

将人的因素加入经济学理论中，主要目的是提高这些理论的预测准确性。同时，它还有另外一点好处，比起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更有趣、更好玩，这是一门不会让人抑郁的科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行为经济学正在不断发展。

2. 机会成本和禀赋效应

某项活动的机会成本是指为了这项活动而放弃的其他活动的价值。

信用卡发卡机构与零售商打起了官司，他们争论的问题是，对于使用信用卡的消费者和支付现金的消费者，商家是否可以收取不一样的价钱。因为信用卡发卡机构会向零售商收取交易处理费用，所以有些零售商，尤其是加油站，想要向信用卡用户收取更高的价钱。

如果商店一定要对使用信用卡的消费者和支付现金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钱，那么“正常价格”应该是向信用卡用户收取的价钱，而现金用户则可以享受“打折”的优惠。另一种方法则是，将向现金用户收取的价钱设定为正常价格，而信用卡用户则需要支付“附加费”。

对于理性的经济人而言，这两种策略其实是一样的。如果向信用卡用户收取 1.03 美元，向现金用户收取 1 美元，那么你将 3 分钱的差价说成是“折扣”或“附加费”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如此，信用卡行业都更倾向于打折的做法，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是正确的。很多年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将这种差别称为“框架”效应。

支付附加费是要从兜里掏钱的，而享受打折“只是”机会成本。泰勒将这种现象称为“禀赋效应”，因为用经济学家的行话说，你拥有的东西属于你的一部分禀赋；另外，他偶然发现，与我们即将拥有的那些东西相比，我们更看重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3. 后见之明的偏见、可预测的错误和有限理性

巴鲁赫和泰勒讲起他的论文，是有关“后见之明的偏见”的，现在这篇论文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很高。该论文的结论是，事情发生过后我们会认为自己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巴鲁赫和泰勒推荐了他的导师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泰勒最开始读的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总结性论文“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这篇文章的论题十分简洁，即人类的时间和脑力是有限的，所以人们会使用简单的经验法则（启发法）做出判断。读了这篇论文后，泰勒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被改变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人们使用这样的经验法则时会犯下“可预测的错误”。可预测的偏见这个概念后来为泰勒的一系列想法提供了框架。

赫伯特·西蒙博学多才，几乎在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很出名，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人工智能和组织理论。他早在特沃斯基和卡尼曼之前就撰文讨论过“有限理性”，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意思是人们缺少解决复杂问题的认知能力，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忽略了西蒙的研究，因为他们很容易将有限理性看作“正确但毫不重要的”概念。

4. 前景理论和价值函数

组织原则包含两种理论：规范性理论和描述性理论。规范性理论会告诉我们思考某一问题的正确方式。如果我们是理性选择理论的践行者，对于规范性理论我们会假设所有人都会得出正确答案。传统思想认为，一个行为理论既可以是规范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而前景理论则试图打破这种传统。这是传统经济学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前景理论在概念上的创新之处。

泰勒从沃顿商学院的霍华德·昆鲁斯那里找到的那篇卡尼曼和沃伦斯基的论文讲述的是不确定下的决策问题。前景理论的最初想法可以追溯到 1738 年的丹

尼尔·伯努利那里。与前景理论相关的是，他解答了其堂兄尼古拉斯·伯努利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将主观考虑因素引入到不确定结果的决策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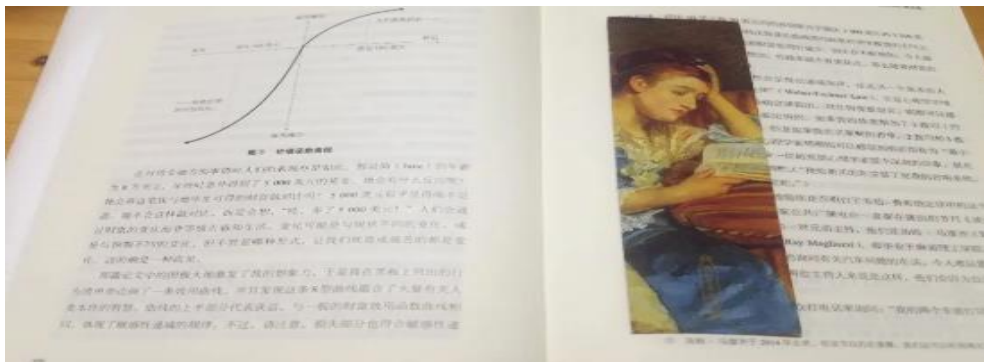
伯努利认为，人们的幸福感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是递减的。这一原理被称为“敏感性递减”，即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一定金额的增量所产生的影响将不断减小。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曲线可用来描述敏感性递减。

全面研究如何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正式理论发表于1944年，即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使用期望效用理论是做决策的正确方式。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预测方法，可以很好地预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选择。这是一个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他们并没有标榜这是一条有用的理性选择指南。

虽然前景理论看起来是符合逻辑的，但经济学家却从未欣然接受它。在此之前，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这个术语，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有限理性的人与完全理性的人有何区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理论，但都没有站住脚跟。

自伯努利之后，经济模型一直基于一种简单的假设，即人们的行为符合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符合基本的财富心理学。但为了创建一个更好的描述性模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意识到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财富的变化而非财富的等级上。这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微小的变化，实际上却是一个重大转变。这是经济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转变，也是他们新理论的真正引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所以将重点放在变化上，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是通过变化来体验生活的。他们设计的价值函数曲线如图3所示。



这条S型曲线蕴含了大量有关人类本性的智慧。曲线的上半部分代表获益，与一般的财富效用函数曲线相同，体现了敏感性递减规律。不过，请注意，损失部分也符合敏感性递减的规律。但损失10美元和20美元间的差别要大于损失1300美元和1310美元间的差别，这就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曲线图与标准经济学模型的不同之处。从某一财富水平开始，随着财富效用的减少，损失在不断增加，令人越来越心痛。也就是如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你越来越不看重获益，那么随着财富的减少，你会越来越看重损失。

我们对现状改变的敏感性会呈现出递减规律，这是另一个基本的人类特征，即“韦伯-费希纳定律”，它是心理学领域最早的发现之一。韦伯-费希纳定律指出，对任何变量而言刚刚可以感觉到的差别与变量的级别是成比例的。心理学家将刚刚可以感觉到的差别称为“最小可觉差”，也就是韦伯比值。最小可觉差是差别阈限的操作性定义，也叫差别感觉阈限。

人们对损失和收益的反应都遵循敏感性递减的规律这一事实还说明了另外一点，即人们会厌恶收益风险，而追逐损失风险。

为说明这一思想，泰勒提出两个问题让我们做出回答，以让我们明白人们会追逐损失风险，而厌恶收益风险，其实两者在逻辑上的道理是一样的。

问题 1：假设你比现在多拥有 300 美元，你要在以下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a) 100%可以得到 100 美元；[72%]

(b) 有 50%的机会得到 200 美元，有 50%的机会一分不得。[28%]

问题 2：假设你比现在多拥有 500 美元，你要在以下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a) 100%会损失 100 美元；[36%]

(b) 有 50%的机会损失 200 美元，有 50%的机会一分不失。[64%]

在问题 2 中，失去第一个 100 美元会比失去第二个 100 美元更令人痛心，所以实验对象宁愿承担失去更多的风险以求一分钱都不损失。他们尤其渴望消除全部损失，原因就在于图 3 中说明的人的第三个特点：厌恶损失。

我们再从图 3 中两条曲线的起点处看一下价值函数。损失函数曲线比获益函数曲线的走势更陡峭，即损失曲线的下降速度比获益曲线的上升速度要快。这张图也说明了禀赋效应。损失造成的痛苦大于收益带来的快乐，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厌恶”，它已成为行为经济学家最强大的研究工具之一。

在这里总结一下：我们会通过变化感受生活，我们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性都符合递减规律，而且损失造成的痛苦大于等量的收益带来的快乐。

5. 假设性问题和史密斯的“诱导价值”

1977 年夏天卡尼曼和沃伦斯基到斯坦福大学做研究，泰勒创造出机会结识了这两位行为经济学的先驱。

泰勒和卡尼曼很快就养成了在山间散步的习惯，边走边交谈，交谈给了他们相互学习的机会。通过相互学习，他们可以了解其他领域学者的想法，以及如何做才能让他们信服某些研究成果。使用假设性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学家一般不会相信这种通过假设性问题或调查问卷得出的结论，他们更关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做的，而不是人们说他们会怎么做。

只需要问人们问题，然后认真研究他们的回答即可，泰勒觉得这种研究方法会让人感到被极大地解放了。他当时想如果读者读到他的那些假设性问题，将会对照检查自己的直觉，然后表示这些行为的确存在。而且，虽然经济学家认为调查方法并不权威，但它肯定比查验自己的直觉要好。泰勒很快也开始用这种方法，但还是有所保留。不过，7 年后，当他和卡尼曼在研究人们对公平的看法时，则

几乎完全依靠假设性问题。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开展研究时需要做实验，泰勒认为自己也应该做些实验。当时出现了一个新领域实验经济学，于是他向该领域的两位创始人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求助，当时普洛特在加州理工学院，而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泰勒先去图森拜访了史密斯。弗农·史密斯和卡尼曼共同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史密斯和卡尼曼的研究计划是不同的。史密斯提倡使用一种叫作“诱导价值”的方法，不交易实际的货物或是玩赌博游戏，而是用代币构建市场。实验人员将代币发给实验对象，并为每个实验对象拥有的代币规定了价值，而该价值对其他实验对象是保密的。实验结束后实验对象可以用手中所剩的代币从实验研究人员那里换取现金。史密斯使用这种方法验证供求关系等经济学原理。

拜访完史密斯，泰勒又去加州理工学院探望了查尔斯·普洛特。让普洛特更感兴趣的是，检测市场规则变化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虽然史密斯和普洛特是很好的人，其研究也很令人钦佩，但泰勒更想研究人类的“行为”。此后，泰勒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道理上越走越远。

6. 行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经历了一场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当时，数学方法逐渐融入经济学理论，以肯尼斯·阿罗、约翰·希克斯、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更是推动了这一潮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因此变得越发具有数学上的正统性。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一直未变，一是经济主体会追求最优化；二是市场会达到均衡。不过，经济学家对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以及市场在何种情况下会达到均衡这两方面的描述却变得越来越复杂。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有关启发法和偏见的研究，以及有关前景理论的研究都清晰地表明，人们的行为根本不像理性经济学模型预测的那样。

经济学家十分重视激励措施，他们常说如果加大激励力度，人们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种说法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但经济学家对此却深信不疑——不管是购买玉米，还是购买汽车，经济学理论都应该同样适用。

加州理工学院的两位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反驳激励理论的证据，他们是戴维·格雷瑟和查尔斯·普洛特。格雷瑟和普洛特偶然接触到萨拉·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奇所做的心理学研究。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发现了偏好反转现象，这打乱了经济学家的惯常思维。用最简单的话说，当有A和B两个选项时，通过诱导，实验对象会表现出更喜欢A，同时也更喜欢B的情况。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人们拥有“明确的偏好”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的发现却摧毁了这一根基。经济学家无法容忍你更喜欢前者的同时也更喜欢后者。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偏好，就不用追求什么最优化了。

有时，传统经济学家会用市场和激励理论一起证明，当利益很大、选择很难时，人们会花钱找专家帮忙。可是问题在于，要想找到一个完全不存在利益冲突

困扰的专家非常困难。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退休计划选择正确的投资组合的人，却能够找到合适的金融顾问、抵押经纪人或房产经纪人，这种想法是不合逻辑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即使公司由人管理，甚至有的管理者可能水平十分有限，激烈的竞争也会驱使公司成为最大利益的追求者。该观点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泰勒认为还是有高估市场竞争作用的嫌疑。

行为经济学要想站稳脚跟，我们必须解答这些问题。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还有些问题需要面对。除了用一句简短的话进行反驳外，我们还可以援引很多实验结果。在这些实验中，实验对象都是真实的人，并且在利益攸关的市场中参与经济活动——甚至是在金融市场中，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最可能是有效的。

作者：常叶青 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

来源：山东工商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WRpAM-vPLgpeNw_F_SKU0w

★学术资源推荐

图书推荐



《法律视角透视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

作者：云大慧

出版发行：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06

ISBN号：978-7-5217-1870-6

中图法分类号：D922.291.914

内容提要：本书从法律角度剖析中国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中的风险，以及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法律法规实施给财富管理带来的重要影响。全书分为物质财富管理说、非物质财富管理说、主体身份规划说、家族企业管理说、财富管理传承工具说、财富管理与传承风险说六大板块，采用法律论述、法律比较、案例分析等方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帮助高净值家庭和财富管理从业者了解和构建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的整体法律体系，对于高净值家庭和财富管理从业者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主权财富基金外国投资偏好研究》

作者：张红霞

出版发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05

ISBN号：978-7-5203-6036-4

中图法分类号：F832.21

内容提要：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新型机构投资者，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十分迅速。主权财富基金不同于其他投资机构，展示出了很强的外国投资偏好，但由于其运营、管理结构等的不透明性，国内外对于主权财富基金外国投资的研究

究十分有限。本书从理论上构建了将收益率（Return）和风险（Risk）同时考虑在内的国际资本移动的外国投资偏好模型（Foreignbiasmodel）。根据理论模型和1990-2014年间主权财富基金的主要投资国与主要投资对象国之间的投资数据：

（1）分析、比较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战略、投资目的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外国投资的影响因素；（2）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计了主权财富基金外国投资偏好的决定因素与外国投资偏好的空间溢出效应；（3）分析、比较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对上市与非上市股的投资特点、投资目的以及投资的决定因素。



《2019 公正财富年度报告系列丛书 公正财富年度报告》

作者：公正财富项目组

出版发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04

ISBN号：978-7-309-14787-2

中图法分类号：F124.7

内容提要：本报告回顾了2019年公正财富项目的发展，全书共分为九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五章，回顾2019年公正财富项目的进展，其中：第一章对2019年公正财富年度主题进行分析；第二、三章则为2019年公正财富评级结果及针对该结果的分析；第四章介绍公正财富数据中心；第五章介绍公正财富的其他项目。第二部分为第六章，阐述公正财富评估的理论及方法。第三部分为第七、八章，回顾公正财富项目的发展，及在这其中参与并帮助公正财富项目发展的人及组织。

《家族财富管理》

作者：石韵

出版发行：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20.04

ISBN号：978-7-5208-1125-5

内容提要：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40年，社会财富快速积累，也使以家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家族企业在增加社会财富、拉动经济增长、推动改革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企业乃至整个民营经济的顺利传承和永续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家族财富管理中的思想和实践方法，探索家族财富管理在中国现今社会中的应用价值，对于我国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长远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书首先介绍了家族财富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家族财富的创造，随后对家族财富管理的规划、咨询、模式和监管以及家族财富的传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阐述，最后就如何培养家族财富的接班人做了探讨。

《财富伦理研究》

作者：何棣华

出版发行：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0.04

ISBN号：978-7-5087-6337-8

中图法分类号：B82-053

内容提要：《财富理论研究》一书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财富伦理的有关问题，是一部比较系统和科学地研究财富伦理的专著。本书具有较强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第一，阐明了财富伦理的概念、性质和研究领域，指出财富伦理所揭示的是以财富为中介的人与其普遍性本质的关系，即个人在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和享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在财富关系基础上看待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和社会集体的关系，就是财富伦理关系。财富伦理是服务于人的发展、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服务于人对其普遍性本质的复归愿望的。

《农民财富伦理观研究》

作者：侯红霞

出版发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04

ISBN号：978-7-203-11391-1

内容提要：本书认为，帮助农民树立正确合理的财富伦理观，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治家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民财富伦理观教育的最有效路径在于运用良好家教家风，涵育农民道德品行。因此，培育农民正确财富伦理观的关键在于良好家教家风在农村社会深入人心。

论文推荐

住房财富与劳动参与决策；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姚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在理论分析住房财富对劳动参与决策影响的基础上，采用CFPS 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四期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住房财富对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住房财富对个体劳动参与决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讲，住房财富每增加10%，个体劳动参与提高0.02-0.06个百分点。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利用居住在同一个村/居的平均住房财富价值作为家庭住房财富的工具变量，采用IV Probit和2SLS分别进行估计，仍然得到了稳健的结果。进一步检验家庭住房财富影响个体劳动参与决策的机制表明，住房财富主要通过财富效应、成本效应和预期效应等渠道影响个体劳动参与决策。

关键词：住房财富；劳动参与决策；CFPS数据；

分类号：F299.23；F249.2

来源及全文链接：《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37（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47982283984&DP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SDJJ202101007&RESULT=1&SIGN=fV1ckGyTKlhmN01uYo9I1dp51fM%3d>

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及改善对策/袁佳，高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历史必然。然而，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不合理，严重制约了“消费→投资→就业→消费”的良性循环，影响双循环战略的实现。造成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较大的原因主要包括：劳动保护制度不完善、户籍制度改革迟缓等导致劳动报酬被长期压低；税收体系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作用有限；金融资源分配存在结构不匹配、不平衡问题；现行土地制度制约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社会保障体系碎片化，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不足。未来，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改善居民收入和

财富分配格局。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消费；劳动报酬；

分类号：F124.7；F126.2

来源及全文链接：《新金融》，2021（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52112723438&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XJRO202101004&RESUL
T=1&SIGN=7FfsL17bezFYKFNWu%2f8RkQFng0%3d](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52112723438&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XJRO202101004&RESUL
T=1&SIGN=7FfsL17bezFYKFNWu%2f8RkQFng0%3d)

新时代财富观的理论阐释及教育思考/黄羽新，韦国友/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财富具有“物”和“人”的双重属性。财富的外在形式是物的形式，其核心内涵是量度人类实践行为属性及其社会内在矛盾的基本尺度。财富观是对财富本质与意义的最基本的认识和体悟，是财富理论的核心。它是人们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对财富的价值理解和认识。新时代的财富观教育，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要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要包含对个体的终极关切。

关键词：财富；财富观；培育；

分类号：G41

来源及全文链接：《社会科学家》，2021（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57315701953&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SHKJ202101022&RESUL
T=1&SIGN=GGermxtDoN1EDHjRTA94sIdXDIY%3d](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57315701953&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SHKJ202101022&RESUL
T=1&SIGN=GGermxtDoN1EDHjRTA94sIdXDIY%3d)

马克思的财富观念及其当代意义/王福生/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摘要：马克思以财富与人自身的关系为核心，历史与逻辑地考察了财富的生产以及财产关系从古代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变化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财富观念，特别是对现代世界财产关系的辩证性以及作为人本身充分富裕发展的财富本身的揭示，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概念、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等思想，对于人们走出“财富幻象”，回归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财富；人；劳动；货币；资本；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激进左翼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批判性研究”（编号15BZX015）的阶段性成果；

分类号：B038

来源及全文链接：《哲学研究》，2020（1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60425789844&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ZXYJ202012004&RESUL
T=1&SIGN=8w5TOo%2bLTUm5SMsU4HmtEhJaL9o%3d](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60425789844&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ZXYJ202012004&RESUL
T=1&SIGN=8w5TOo%2bLTUm5SMsU4HmtEhJaL9o%3d)

互联网慈善平台运作的多重效应及其对慈善生态的影响/林卡，李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互联网募捐平台逐步建立并发挥作用，不仅给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也创设了开展慈善活动的新环境。深入研究互联网慈善平台运行的特点和效应就成为理解现时代慈善活动社会环境的基本要求。研究发现；互联网慈善机制的运行受网络平台运作的流量控制、技术门槛、监管与运作规程等特点

影响，并呈现流量效应、涨落效应、挤压效应、虚拟效应等多重效应。对于这些特点和效应的分析可以反映互联网慈善的成长对中国慈善生态的影响，揭示中国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互联网慈善；慈善平台；慈善生态；效应；社会政策；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9ASH016）；浙江省慈善联合会与敦和基金会的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分类号：D632.9

来源及全文链接：《浙江社会科学》，2021（02）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64023455859&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DAY&FileName=ZJSH202102011&RE
SULT=1&SIGN=c5imgdd4X%2f489IeKFrSLpCEAPCA%3d](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64023455859&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DAY&FileName=ZJSH202102011&RE
SULT=1&SIGN=c5imgdd4X%2f489IeKFrSLpCEAPCA%3d)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分析视角/
徐道稳/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经历了复苏、管控、规范化、大众化和法治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慈善理念逐步从行善积德向社会变革转变，慈善主体从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转变，慈善领域从扶贫济困向社会公益转变，慈善方式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我国慈善事业的转型发展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变迁而逐步展开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慈善事业实现了从“求生存”向“谋发展”转变。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下，慈善事业不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正在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改革开放；慈善事业；转型发展；国家发展战略；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ASH010）的阶段性成果；

分类号：D632.9

来源及全文链接：《社会科学》，2021（01）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65971649219&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SHKX202101008&RESU
LT=1&SIGN=n0AhAHYotIt9hBqW8Xq%2fbaaVmc0%3d](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TIMESTAMP=637484665971649219&D
BCODE=CJFD&TABLEName=CJFDAUTO&FileName=SHKX202101008&RESU
LT=1&SIGN=n0AhAHYotIt9hBqW8Xq%2fbaaVmc0%3d)